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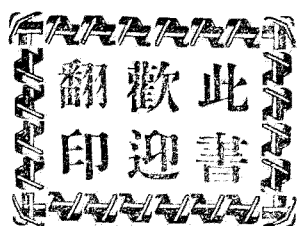
梁任公先生最近講演集

中華民國十一年二月初版

梁任公先生最近講演集

每册定價大洋三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新會楊維新

寄售處

上海商務印書館及各省分館
其他各大書坊

印刷者 協成印刷局

天津南馬路榮業大街

電話三千一百零四號

梁任公先生最近講演集叙

吾師梁任公先生爲我國近數十年學術政治社會之指導人，其言論著述均有轉移全國風氣之偉力，此天下所公認無俟贅言。先生近在天津南開大學講演中國文化史，著述之餘，時應京津各學校之請，爲公開講演，計自去年雙十節紀念日以來，兩月之間，凡共七次，鴻篇讜論，震動一時。新追隨輯錄，裒然成帙，諸篇雖曾載之京津各報，然零篇斷簡，易於散落，而內地及各處朋儕，紛函索，更以不得窺見爲憾，茲將屢次所錄，彙爲一篇，付諸排印。夫先生本其「知不可而爲」與「爲而不有」之直覺，以盡其責任於社會，則道之隆污，言之顯晦，原非所計，而吾儕無此修養，時以理智較量事實，覺國是之艱危，民生之顛沛，何時始已，如航海而遇颶風，茫乎其無畔岸，如黑夜而適曠野，窅然失其津途，今聞先生各論始知自後吾儕青年，應取之方針，其爲社會之明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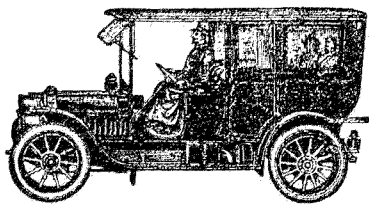
者即在於此。書萬本誦萬遍，使家喻而戶曉，此凡吾儕青年之志，抑亦國民應有之責也。

中華民國十一年二月楊維新

梁任公先生最近講演集目錄

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	一
市民與銀行	二四
太平洋會議中兩種外論闢謬	一四
無槍階級對有槍階級	一六
續論市民與銀行	一四
「知不可而爲」主義與「爲而不有」主義	二〇
外交歟？內政歟？	三八

目
錄



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

(雙十節天津學界全體慶祝會講演)

今日天津全學界公祝國慶，鄙人得參列盛會，榮幸之至。我對於今日的國慶，有兩種感想：第一，是辛亥革命之意義；第二，是十年雙十節之樂觀。請分段說明，求諸君指教。

革命兩個字真算得中國歷史上的家常茶飯：自唐虞三代以到今日，做過皇帝的，大大小小不下三四十家，就算是經了三四十回的革命。好像戲台上，一個紅臉人鬼混一會，被一個黑臉人打下去了，黑臉人鬼混一會，又被一個花臉人打下去了。拿歷史的眼光看過去，真不知所爲何來。一千多年前的劉邦、曹操、劉淵、石勒，是這副嘴臉，一千多年後的趙匡胤、朱元璋，忽必烈、福臨，也是這副嘴臉。他所走的路線，完全是「兜圈子」，所以可以說是絕無意義。我想中國歷史上有意義的革命，只有三回：第一回，是周朝的革命，打破黃帝堯舜

以來部落政治的局面；第二回，是漢朝的革命，打破三代以來貴族政治的局面。第三回就是我們今天所紀念的辛亥革命了。

辛亥革命有甚麼意義呢？簡單說：

一面是現代中國人自覺的結果。

一面是將來中國人自發的憑藉。

自覺！覺些甚麼呢？

第一：覺得凡不是中國人都沒有權來管中國的事。

第二：覺得凡是中國人都有權來管中國的事。

第一件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覺，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覺。這兩種精神，原是中國人所固有；到最近二三十年間，受了國外環境和學說的影響，於是多年的「潛在本能」忽然爆發，便把這回絕大的自覺產生出來。如今請先說頭

一件的民族精神。原來一個國家被外來民族征服，也是從前歷史上常有之事，因為凡文化較高的民族，一定是安土重遷，流於靡弱，碰着外來游牧慍悍的民族，很容易被他蹂躪。所以二三十年來，世界各文明國，沒有那一國不經過這種苦頭。但結果這民族站得住或站不住，就要看民族自覺心的強弱。何如。所謂自覺心，最要緊的是覺得自己是「整個的國民」。永遠不可分裂，不可磨滅。例如猶太人，是整個卻不是國民，羅馬人是國民卻不是整個，印度人既不是國民，更不是整個了，所以這些國從前雖然文化燦爛，一被外族征服，便很難爬得轉來。講到我們中國，這種苦頭，真算喫得穀受了。自五胡亂華以後，跟着甚麼北魏咧，北齊咧，北周咧，遼咧，金咧，把我們文化發祥的中原，鬧得稀爛；後來蒙古滿洲，更了不得，整個的中國，完全被他活吞了。雖然如此，我們到底把他們攆了出去，四五千年前祖宗留下來這分家產，畢竟還在僑們手裏。

諸君別要把這件事情看得很容易啊！請放眼一看，世界上和我們平輩的國家，如今都往那裏去了？現在赫赫有名的國家，都是比我們晚了好幾輩。我們好像長生不老的壽星公，活了幾千年，經過千災百難，如今還是和小孩子一樣，萬事都帶幾分幼稚態度。這是什麼原故呢？因為我們自古以來，就有一種覺悟，覺得我們這一族人像同胞兄弟一般，拿快利的刀也分不開。又覺得我們這一族人，在人類全體中關係極大，把我們的文化維持擴大一分，就是人類幸福擴大一分。這種觀念，任憑別人說我們是保守也罷，說我們是驕慢也罷，總之我們斷斷乎不肯自己看輕了自己，確信我們是世界人類的優秀分子，不能屈服在別的民族底下，這便是我們幾千年來能穀自立的根本精神。民國成立前二百多年，不是滿洲人做了皇帝嗎？到了後來，面子上雖說是中國人被滿洲人征服，骨子上已經是滿洲人被中國人征服，因為滿洲漸漸同

化到中國他們早已經失了一個民族的資格了。雖然如此，我們對於異族統治的名義也斷斷不能忍受。這並不是爭甚麼面子問題，因為在這種名義底下，國民自立的精神，總不免萎縮幾分。所以晚明遺老像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張蒼水這一班人，把一種極深刻的民族觀念，傳給後輩，二百多年，未嘗斷絕。到甲午年和日本打一仗，打敗了，我們覺得這並不是中國人打敗，是滿洲人拖累着中國人打敗。恰好碰着歐洲也是民族主義最昌的時代，他們的學說，給我們極大的激刺，所以多年來磅礴鬱積的民族精神，盡情發露，排滿革命，成爲全國人信仰之中堅。那性質不但是政治的，簡直成爲宗教的了。

第二件再說那民主精神：僭們雖說是幾千年的專制古國，但僭們向來不承認君主是什麼神權，什麼天授。歐洲中世各國，都認君主是國家的主人，國家是君主的所有物；僭們腦筋裏頭，卻從來沒有這種謬想。僭們所篤信的主義，

就是孟子說的『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拿一個鋪子打譬，人民是股東，皇帝是掌櫃；股東固然有時懶得管事，到他高興管起事來，把那不妥當的掌櫃攆開，卻是認爲天經地義。還有一件，僂們向來最不喜歡政府擴張權力，干涉人民；僂們是要自己料理自己的事，僂們雖然是最能容忍的國民，倘若政府侵僂們自由超過了某種限度，僂們斷斷不能容忍。僂們又是二千年來沒有甚麼階級制度，全國四萬萬人都是一般的高，一樣的大；一個鄉下窮民，只要他有本事，幾年間做了當朝宰相，並不爲奇；宰相辭官回家去，還同小百姓一樣，受七品知縣的統治，法律上並不許有什麼特權。所以政治上自由平等兩大主義，算是我們中國人二千年來的公共信條。事實上能得到甚麼程度，雖然各時代各有不同；至於這種信條，在國民心目中，卻是神聖不可侵犯。我近來常常碰着些外國人，很疑惑我們沒有民治主義的根柢，如何能覈實行

共和政體，我對他說，恐怕中國人民治主義的根柢，只有比歐洲人發達的早，並沒比他們發達的遲；只有比他們打疊的深，並沒比他們打疊的淺。我們本來是最「德謨克拉西」的國民，到近來和外國交通，越發看真「德謨克拉西」的好處，自然是把他的本性，起一種極大的衝動作用了。回顧當時清末的政治，件件都是和我們的信條相背，安得不一齊動手端茶碗送客呢？

當光緒宣統之間，全國有智識有血性的人，可算沒有一個不是革命黨。但主義雖然全同，手段卻有小小差異。一派注重種族革命，說是只要把滿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說是把民治機關建設起來，不愁滿洲人不跑。兩派人各自進行，表面上雖像是分歧，目的總是歸着到一點。一面是同盟會的人，暗殺咧，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許多壯烈行爲；一面是各省諮議局中立憲派的人，請願咧，彈劾咧，用公開手段做了許多羣衆運動。這

樣子鬧了好幾年，犧牲了許多人的生命財產。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機會湊巧，便不約而同的起一種大聯合運動。武昌一聲礮響，各省諮議局先後十日間，各自開一場會議，發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鋪產的掌櫃，便乖乖的把全盤交出，我們永遠託命的中華民國便頭角崢嶸的誕生出來了。這是誰的功勞呢？可以說誰也沒有功勞，可以說誰也有功勞。老實說一句，這是全國人的自覺心，到時一齊迸現的結果。現在僂們中華民國，雖然不過一個十歲小孩，但僂們卻是千信萬信，信得過他一定與天同壽。從今以後，任憑他那一種異族，野蠻咧，文明咧，日本咧，歐美咧，獨占咧，共管咧，若再要來打那統治中國的壞主意，可斷斷乎做不到了。任憑甚麼人，堯舜咧，桀紂咧，劉邦李世民朱元璋咧，王莽朱溫袁世凱咧，若再要想做中國皇帝，可是海枯石爛不會有這回事了。這回革命，就像經過商周之間的革命，不會退回到部落酋長的世界；就像

經過秦漢之間的革命，不會退回到貴族階級的世界。所以從歷史上看來，是有空前絕大的意義，和那紅臉打倒黑臉的把戲，性質完全不同。諸君啊！我們年年雙十節紀念，紀念個甚麼呢？就是紀念這個意義。爲甚麼要紀念這個意義，爲要我們把這兩種自覺精神，越加發揚，越加普及，常常提醒，別要忘記。如其不然，把這雙十節當作前清陰歷十月初十的皇太后萬壽一般看待，白白放一天假，躲一天懶，難道我們的光陰這樣不值錢，可以任意荒廢嗎？諸君想想啊！

我下半段要說的是十年雙十節之樂觀。想諸君驟然聽著這個標題，總不免有幾分詫異，說是現在人民痛苦到這步田地，你還在那裏樂觀，不是全無心肝嗎？但我從四方八面子細研究，覺得這十年間的中華民國除了政治一項外，沒有那一樣事情不是可以樂觀的，就算政治罷，不錯，現時是十分悲觀，但

這種悲觀資料，也並非很難掃除，只要國民加一番努力，立刻可以轉悲爲樂。請諸君稍耐點煩，聽我說明：

樂觀的總根源，還是剛纔所說那句老話：「國民自覺心之發現。」因爲有了自覺，自然會自動，會自動自然會自立。一個人會自立，國民裏頭便多得一個優良分子；個個人會自立，國家當然自立起來了。十年來這種可樂觀的現象，在實業教育兩界，表現得最爲明顯。我如今請從實業方面舉幾件具體的事例：宣統三年，全國紡紗的錠數，不滿五十萬錠，民國十年，已超過二百萬錠了；日本紗的輸入，一年一年的遞減，現在已到完全封絕的地步。宣統三年，全國產煤不過一千二三百萬噸，民國十年，增加到二千萬噸了。還有一件應該特別注意的：煤鑛事業裏頭，完全中國人資本，中國人自當總經理，中國人自當工程師，這三個條件具備的礦，一個也沒有，所出的煤，一噸也沒有，到民國十

年，在這條件之下所產的煤四百萬噸，幾乎占全產額四分之一了。此外像製絲啦，製麪粉啦，製烟啦，製糖啦，製鹽啦，農墾啦，漁牧啦，各種事業，我也不必列舉統計表上許多比較的數目字，免得諸君聽了麻煩，簡簡說一句，都是和紗廠煤礦等業一樣，有相當的比例進步。諸君試想，從前這種種物品，都是由外國輸入，或是由外國資本家經營，我們每年購買出了千千萬萬金錢去脹外國人，如今挽回過來的多少呢？養活職工又多少呢？至如金融事業，宣統三年，中國人自辦的只有一個大清銀行，一個交通銀行，辦得實在幼稚可笑；說到私立銀行，全國不過兩三家，資本都不過十萬以內。全國金融命脈，都握在上海香港幾家外國銀行手裏頭，捏扁搓圓，憑他尊便。到今民國十年，公私大小銀行有六七十家，資本五百萬以上的亦將近十家，金融中心，漸漸回到中國人手裏，像那種有外國政府站在後頭的中法銀行，宣告破產，還是靠中國銀

行家來救濟整理，中國銀行公會的意見，五國銀行團不能不表相當的尊重了。諸君啊！諸君別要誤會，以爲我要替資本家鼓吹。現在一部分的資本家誠不免用不正當的手段，掠得不正當的利益，我原是深惡痛恨；而且他們的事業，也難保他都不失敗。但這些情節，暫且不必多管；我總覺得目前這點子好現象，確是從國民自覺心發育出來：『中國人用的東西，爲什麼一定仰給外國人？』這是自覺的頭一步；『外國人經營的事業，難道中國人就不能經營嗎？』這是自覺的第二步；『外國人何以經營得好，我們從前趕不上人家的在什麼地方？』這是自覺的第三步。有了這三種自覺，自然會生出一種事實來：就是『用現代的方法，由中國人自動來興辦中國應有的生產事業。』我從前很耽心，疑惑中國人組織能力薄弱，不能舉辦大規模的事業。近來得了許多反證，把我的疑懼逐日減少。我覺得中國人性質，無論從那方面看去，總看

不出比外國人弱的地方；所差者還是舊有的學問智識，對付不了現代複雜的社會。即如公司一項，前清所辦的什有八失敗，近十年內卻是成功的成數比失敗的多了。這也沒甚麼稀奇，從前辦公公司的不是老官場便是老買辦，一釐新智識也沒有；如今年富力強的青年或是對於所辦事業有專門學識的，或是受過相當教育常識豐富的，漸漸插足到實業界。就算老公子裏頭的老輩，也不能不汲引幾位新人物來做臂膀。簡單說一句，實業界的新人物新方法，對於那舊的已經到取而代之的地位了。所以有幾家辦得格外好的，不惟事事不讓外國人，只有比他們還要嶄新進步。剛纔所說的是組織方面，至於技術方面，也是同樣的進化。前幾天有位朋友和我說一段新聞，我聽了甚有感動，諸君若不厭麻煩，請聽我重述一番。據說北京近來有個製酒公司，是幾位外國留學生創辦的，他們卑禮厚幣從紹興請了一位製酒老師傅來。那位

老師傅頭一天便設了一座酒仙的牌位要帶領他們致敬盡禮的去禱拜。這班留學生，自然是幾十個不願意，無奈那老師傅說不拜酒仙，酒便製不成，他負不起這責任；那些留學生因為熱心學他的技術，只好胡亂陪著拜了。後來這位老師傅很盡職的在那裏日日製酒，卻是每回所製總是失敗；一面這幾位學生在旁邊研究了好些日子，知道是因為南北氣候和其他種種關係所致，又發明種種補救方法，和老師傅說，老師傅總是不信。後來這些學生用顯微鏡把發酵情狀打現出來給老師傅瞧，還和他說明所以然之故；老師傅聞所未聞，纔恍然大悟的說道：『我向來只怪自己拜酒仙不誠心，或是你們有什麼沖撞，如今纔明白了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從此老師傅和這羣學生教學相長，用他的經驗來適用學生們的學理，製出很好的酒來了。這段新聞聽著像很瑣碎無關輕重，卻是「科學的戰勝非科學的」真憑實據。又可見

青年人做事，要免除老輩的阻力而且得他的幫助，也並非難；只要你有真實學問，再把熱誠貫注過去，天下從沒有辦不通的事啊。我對民國十年來生產事業的現象，覺得有一種趨勢最爲可喜，就是科學逐漸占勝。科學的組織，科學的經營，科學的技術，一步一步的在我們實業界中得了地盤。此後凡屬非科學的事業，都要跟着時勢變計改良，倘其不然，就要劣敗淘汰去了。這種現象，完全是自覺心發動擴大的結果，完全是民國十年來的新氣象。諸君想想，這總算彀得上樂觀的好材料罷。

在教育方面，越發容易看得出來。前清末年辦學堂，學費膳費書籍費，學堂一攬千包，還倒貼學生膏火，在這種條件底下招考學生，卻是考兩三次還不足額。如今怎麼樣啦，送一位小學生到學校，每年百打百塊錢，大學生要二三百，然而稍爲辦得好點的學校，那一處不是人滿爲什麼呢？這是各家父兄有極

深刻的自覺，覺得現代的子弟非求學問不能生存。在學生方面，從前小學生逼他上學，好像拉牛上樹，如今卻非到學堂不快活了。大學生十個裏頭，總有六七個曉得自己用功，不必靠父師督責。一上十五六歲，便覺得倚賴家庭，是不應該的，時時刻刻計算到自己將來怎樣的自立。從前的普通觀念，是想做官纔去讀書。現在的學生，他畢業後怎麼的變遷，雖然說不定，若當他在校期間，說是打算將來拿學問去官場裏混飯喫，我敢保一千人裏頭找不着一個。以上所說這幾種現象，在今日看來，覺得很平常；然而在十年前卻斷斷不會有的。爲甚麼呢？因爲多數人經過一番自覺之後纔能得來，所以斷斷不容假借。講到學問本身方面，那忠實研究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增長；固然是受了許多先輩提倡的影響，至於根本的原因，還是因爲全國學問界的水平線提高了，想要學十年前多數學生的樣子，靠那種「三板斧」「半瓶醋」的學問來自

欺欺人，只怕不會站得住。學生有了這種自覺，自然會趨到忠實研究一路了。既有了研究精神，興味自然是愈引愈長，程度自然是愈進愈深。近兩年來「學問飢餓」的聲浪，瀰漫於青年社會，須知凡有病的人，斷不會覺得饑餓。我們青年覺得學問饑餓，便可證明他那「學問的胃口」消化力甚強；消化力既強，營養力自然也大，俗們學問界的前途，誰能設限量他呢？有人說：「近來新思潮輸入，引得許多青年道德墮落，是件極可悲觀的事。」這些話，老先生們提起來，什有九便皺眉頭。依我的愚見，勸他們很可以不必白操這心。人類本來是動物不是神聖，「不完全」就是他的本色。現在不長進的青年固然甚多，難道受舊教育的少爺小姐們，那下流種子又會少嗎？不過他們的醜惡，遮掩起來，許多人看不見罷了。凡一個社會當過渡時代，魚龍混雜的狀態，在所不免；在這個躺口，自然會有少數人走錯了路，成了時代的犧牲品；但算起

總帳來，革新的文化，在社會總是有益無害。因為這種走錯路的人，對於新文化本來沒有什麼領會，就是不提倡新文化，他也會墮落。那些對於新文化確能領會的人，自然有法子鞭策自己規律自己，斷斷不至於墮落。不但如此，那些借新文化當假面具的人，終久是在社會上站不住，任憑他出風頭出三兩年，畢竟要屏出社會活動圈以外；騰下這些在社會上站得住的人，總是立身行己，有些根柢。將來新社會的建設，靠的是這些人，不是那些人。所以我對於現在青年界的現象，覺得是純然可以樂觀的，別人認為悲觀的材料，在我的眼內，都不成問題。

以上不過從實業教育兩方面立論，別的事在今天的短時間內恕我不能多舉。總起來說一句，僑們十個年頭的中華民國，的確是異常進步。前人常說理想比事實跑得快，照這十年的經驗看來，倒是事實比理想跑的快了。因為有

許多事項，我們當宣統三年的時候，絕不敢說十年之內會辦得到，哈哈！如今早已實現了。尤可喜的是社會進步所走的路，一點兒沒有走錯。你看近五十年來的日本，不是跑得飛快嗎？可惜路走歪了，恐怕跑得越發遠，越發回不過頭來。我們現在所走的，卻是往後新世界平平坦坦的一條大路；因為我們民族，本來自由平等的精神是很豐富的，所以一到共和的國旗底下，把多年的潛在本能發揮出來，不知不覺，便和世界新潮流恰恰相應。現在萬事在草創時代，自然有許多不完全的地方，而且常常生出許多毛病，這也無庸爲諱。但方向既已不錯，能力又不缺乏，努力前進的志氣又不是沒有，像這樣的國民，你說會久居人下嗎？還有一件，請諸君別要忘記：我們這十年內社會的進步，乃是從極黑暗極混亂的政治狀態底下，勉強掙扎得來。人家的政治，是用來發育社會，我們的政治，是用來摧殘社會。老實說一句：十年來中華民國的人

民，只算是國家的孤臣孽子。他們在這種境遇之下，還掙得上今日的田地。倘使政治稍爲清明幾分，他的進步還可限量嗎？

講到這裏，諸君怕要說：『梁某人的樂觀主義支持不下去了。』我明白告訴諸君：我對於現在的政治，自然是十二分悲觀，對於將來的政治，卻還有二十四分的樂觀哩！到底可悲還是可樂，那關鍵卻全在國民身上。國民個個都說『悲呀！悲呀！』那真成了舊文章套調說的『不亦悲乎！』只怕跟著還有句『嗚呼哀哉！』呢。須知政治這樣東西，不是一件礦物，也不是一個鬼神；離卻人沒有政治，造政治的橫豎不過是人。所以人民對於政治，要他好他便好了，隨他壞他便壞了。須知十年來的壞政治，大半是由人民縱壞。今日若要好政治，第一是要人民確然信得過自己有轉移政治的力量；第二是人民肯把這分力量拿出來用。只要從這兩點上有徹底的自覺，政治由壞變好，有什麼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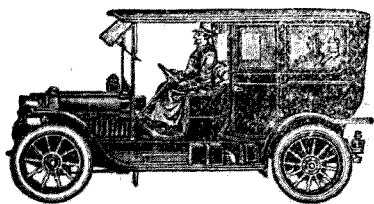
拿一家打譬，主人懶得管事，當差的自然專橫，專橫久了，覺得他像不知有多大的神通，其實主人稍爲發一發威，那一個不怕。現在南南北北甚麼總統咧，巡帥咧，聯帥咧，督軍咧，總司令咧，都算是素來把持家政的悍僕。試問他們能有多大的力量，能有多久的運命？眼看著從前在臺面上逞威風的，已經是一排一排的倒下去，你要知道現時站在臺上的人結果如何，從前站的人就是他的榜樣。我們國民多半拿軍閥當作一種悲觀資料，我說好像怕黑的小孩，拿自己的影子嚇自己。須知現在紙糊老虎的軍閥，國民用力一推，固然要倒，就是不推他也自己要倒。不過推他便倒得快些，不推他便倒得慢些。他們的末日，已經在閻羅王冊上注了定期，在今日算不了什麼大問題。只是一件，倘若那主人還是老拿著不管事的態度，那麼這一班壞當差的去了，別一班壞當差的還推升上來，政治卻永遠無清明之日了。講到這一點嗎，近來許多好

人打著不談政治的招牌，卻是很不應該。社會上對於談政治的人，不問好歹，一概的厭惡冷淡，也是很應該。國家是誰的呀？政治是誰的呀？正人君子不許談有學問的人不許談，難道該讓給亡清的貪官污吏來談，難道該讓給強盜頭目來談，難道該讓給流氓痞棍來談？我奉勸全國中優秀分子，要從新有一種覺悟：『國家是我的，政治是和我生活有關係的；談，我是要談定了！管，我是要管定了。』多數好人都談政治，都管政治，那壞人自然沒有站腳的地方。再申說一句：只要實業界教育界有嚴重監督政治的決心，斷不愁政治沒有清明之日。好在據我近一兩年來冷眼的觀察，國民喫政治的苦頭已經吃够了，這種覺悟已經漸漸成熟了。我信得過我所私心祈禱的現象，不久便要實現。方纔說的對於將來政治有二十四分樂觀就是爲此。

諸君！我的話太長了，麻煩諸君好幾點鐘，很對不起。但盼望還容我總結幾句：

諸君啊？要知道希望。是人類第二個生命。悲觀是人類活受的死刑。一個人是如此。一個民族也是如此。古來許多有文化的民族。爲甚麼會滅亡得無影無踪呀？因爲國民志氣一旦頹喪了，那民族便永遠翻不轉身來。我在歐洲看見德奧兩國戰敗國人民，德國人還是個個站起來，奧國人已經個個躺下去，那兩國前途的結果，不問可知了。我們這十歲大的中華民國，雖然目前像是多災多難，但他的稟賦原來是很雄厚的，他的環境又不是和他不適，他這幾年來的發育，已經可觀，難道還怕他會養活不成，養活成了還怕沒有出息嗎？只求國民別要自己看不起自己，別要把志氣衰頹下去，將來在全人類文化上，大事業正多着哩。我們今天替國家做滿十歲的頭一回整壽，看著過去的成绩，想起將來的希望，把我歡喜得幾乎要發狂了。我願意跟著諸君齊聲三呼『中華民國萬歲』

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



市民與銀行

(十一月二十一日天津)
南開大學公開講演

這幾天很不幸，忽然有中交兩行擠兌的事。關於這件事，我們一般市民，應該有兩種根本覺悟：

第一是：現在的覺悟。

第二是：將來的覺悟。

現在的覺悟，就是『做買賣的人萬不可以拒絕國鈔的收用；手邊拿着有國鈔的人萬不可以去擠兌』。若然不信用我這話嗎？老實說：不但是破壞銀行，破壞國家簡直是自己和自己過不去。爲什麼呢？因爲拒收和擠兌的結果，不外把你自己的財產價值消失或減削了。這種道理且等下文詳細說明。現在第一段先說擠兌心理的不對，第二段把我所知道的兩行情形和這回風潮的起因，略說一說再入正文。

擠兌這件事，真算得中國人獨有的古怪把戲。諸君諒來都知道歐戰以來，歐洲各國的經濟財政，都是困難達於極點了。我們試查一查六七年來的新聞紙，曾否聽見過有一回說是某國國家銀行被擠，某國市面不行用國鈔？中國人或者以爲人家的政府威信好，所以人民不敢如此。其實不然，外國人關於本身或公衆利害問題，向來沒有一件肯饒讓政府稍爲有點不對，動輒就起羣衆運動。何以我們慣用的什麼擠兌手段拒收手段，他們始終沒有用過一回呢？因爲這種手段，絕不能向政府示威，只算是向社會搗亂，只算是和自己開頑笑，所以稍有常識的國民，斷斷不肯如此。

擠兌和拒收，是發生於一種極可惡極可笑極可憐的心理。甚麼心理呢？就是『在大家不安寧的環境當中，想我一個人的安寧，在千千萬萬人危險裏頭，單獨我一個人免掉危險。』你想這種道理會行得通嗎？這種事情會辦得到

嗎？人類是社會的動物，斷不能離卻社會獨自一個人生存。想自己免掉危險，除了協同防止或救濟社會的共同危險外，沒有別的法子。左傳說得好：『螻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這本是很淺而易見的道理。中國人不曉得怎麼了，對於這點道理始終看得不明白，信得不真切。這種「不管公衆怎麼樣，只求個人免掉危險」的卑劣心理，就是亡國滅種的總根原。其實結果自己何嘗免得掉？不惟免不掉，或者本來並沒危險，因爲這一點卑劣心理，無端造出危險來，鬧到社會和自己同歸於盡。這種卑劣心理，中國人真是無處不發現，這幾天鬧的什麼拒收咧擠兌咧，就是這種心理的充分表示，就是因想免掉危險，反而生出危險的最好證據。說起來真是又可恨又可笑又可憐。我這泛論，姑止於此，而今且說銀行情形：

原來中交兩行，在民國五年的時候，我們對於他很不放心，因爲他差不多完

全是政府的機關。正惟是那樣，所以那時候他的安全和危險，也和我們沒有甚麼大關係。到如今卻是不同了：他們都已有了覺悟，知道銀行的根本生命不在政府而在市場。再加以近兩三年來，國內產業勃興，新組織的公司很多，生意都做得很好，所以他們把他所有的力量，都用來市面上招攬主顧，不甚願意和政府打交道。簡單說：他們是已經做了市民的機關，不是政府的機關了。他們這兩年來，聯合各家私立銀行，組織個銀行公會，力量積得的很雄厚，卻是生意還是做得很踏實。他們力量的雄厚，也不必要我替他鼓吹；諸君諒來還記得幾個月以前，中法銀行倒帳，我們銀行公會因為要維持市面，拍着胸脯，幾百萬的鈔票都兌下來了！還有一件事，諸君或者未必都知道，就是前二十多天有一筆到期的公債，應該在關餘上償還，關餘一時未交到，我們的銀行公會就墊了四百多萬！這件事就是這風潮的原因之一，下文再說。就這

兩件事而論，我們可以證明銀行公會很對得起市民，他們的力量也實在。是。擔得起。擔子。至於他們生意做得踏實，我也有證據：現在北京天津張家口三處中交兩行發的鈔票，通計不到一千五百餘萬元，拿他所流通地方的人口比例起來，每人不過攤得五毛多錢。諸君稍爲學過經濟學的人，諒來都知道貨幣的性質不過市面上一種籌碼，籌碼太多了固然無用，太少了也是不敷。照中國現在經濟狀況說來，這一塊大地方，僅僅有這點子籌碼，只嫌太少，不嫌太多。我記得這回擠兌風潮發生的前三日，我還和中國銀行裏頭一位重要的談天，他說：『今年因爲北幾省年成很好，貨幣需要加增，許多現錢散到鄉下去，鄉下人是和印度人同一樣脾氣，都喜歡將銀子埋在地窖子，鬧到市面上交易媒介物缺乏，依著經濟學的公例，這時候是應該多發鈔幣，等明年春天收回，但現在這種時局，我們是一張鈔票不敢多發，不惟不敢多發，而

且是見一張收回一張，細想起來，實在是自衛心太過，有點對不起市面。」我當時和他說：「他們這種謹慎態度，是很好的，但謹慎也不可太過分了。」到這時候想來，還是他們閱歷之談，很可佩服。若依著書獃子的腦筋，用外國通行公例來調劑金融，這時還不知亂子鬧到怎樣大呢？閑話少講，總之這種實情，我們可以認爲銀行中人做生意十分踏實的證據。然則這回風潮怎麼會鬧出來呢？我們局外人，自然不能知道底細。據這幾天有些報紙說是外國人要實行「國際共管」的野心，妒忌我們銀行公會做他的阻力，趁太平洋會議初開時，給我們一頓「悶頭棍」，要制我的死命。他們算定了中國人民智識幼稚，稍爲放點子風聲，一定要擠兌，一擠兌我們的銀行全盤要倒。他們便可以爲所欲爲。這些話確不確，我沒有憑據，不敢便下判斷。倘然是如此嗎？那麼我們的智識程度，真是被人家一猜便中了。人家要我們擠兌，我們便像專制時

代。奉。着。聖。旨。一。般。拚。命。去。擠。兌。鬧。到。我。們。全。國。人。神。嚎。鬼。哭。人。家。暗。地。裏。點。頭。微。笑。唉。我。們。爲。甚。麼。傻。到。這。步。田。地。呢。我。明。白。告。訴。諸。君。說。各。國。的。鈔。票。有。三。分。之。一。的。現。金。準。備。便。算。千。穩。萬。當。了。我。們。呢。別。的。地。方。不。必。多。說。我。所。知。道。的。天。津。中。國。銀。行。便。的。的。確。確。有。五。成。以。上。的。準。備。——出。一。萬。元。鈔。票。庫。裏。存。著。五。千。多。元。預。備。兌。換。聽。說。他。帳。目。也。曾。向。商。會。公。開。我。想。我。們。任。誰。要。去。看。帳。都。可。以。看。出。來。這。真。算。是。極。謹。慎。極。呆。板。的。做。法。了。北。京。準。備。大。概。少。些。要。知。他。並。不。是。沒。有。準。備。是。不。願。意。把。這。許。多。現。銀。放。在。北。京。在。他。處。一。調。還。是。可。以。調。來。他。們。的。情。形。既。已。如。此。諸。君。卻。還。要。想。想。雖。然。有。五。成。以。上。的。準。備。所。缺。的。還。有。四。成。多。像。我。們。市。民。這。幾。天。的。樣。子。去。擠。便。有。一。百。個。銀。山。也。要。擠。倒。他。們。這。幾。天。限。制。兌。換。論。理。原。是。不。應。該。但。我。們。市。民。既。如。此。不。明。事。理。叫。他。們。有。什。麼。辦。法。呢。尤。須。知。我。們。銀。行。若。將。全。部。兌。出。這。些。銀。子。三。五。日。

內。拐。幾。個。灣。便。全。部。跑。到。外。國。銀。行。的。庫。裏。了。所。以。限。制。兌。換。雖。然。不。合。理。我。們。爲。全。國。人。經。濟。上。的。自。衛。起。見。我。倒。替。銀。行。界。十。分。原。諒。哩。

諸君聽我剛纔的話說鈔票有五成以上的準備，那麼那四成多豈不是無着落嗎？驟然聽見，少不免就要驚慌起來。其實這是極普通極淺白的道理，稍讀過一兩部經濟學書的人都曉得。我正在要將這道理提要說說恰好見著北京報紙上登有馬寅初先生在北大講演，甚爲簡明，我且把他重述一番，便了。馬先生講演的要點，在論鈔票如何發出如何收回。他的大意說是：

「我們中國人不甚了解鈔票的性質，總以爲銀行現洋不足所以發出鈔票來代現洋，鈔票越多，獲利越厚。爲什麼獲利呢？就是靠行使一片空紙。這些話最易動聽，但是全然看錯了。須知鈔票斷不能憑空發出，一定是有些商人或製造家向銀行借款，銀行才拿鈔票給他……譬如某家米商要

到某處辦米，自然要帶鉅款前往；於是向銀行借款，拿米做抵押。銀行便發出鈔票交給那米商，米商便拿來付米價工資以及其他種種開銷；不到幾天，這鈔票便分布到各處。不知者以爲這鈔票係一片空紙，毫無價值。殊不知這鈔票代表的便是米。……米爲有價值的物質，但使那這種物質一日存在，那代表他的鈔票，斷無成爲廢物之理。」

『鈔票既是代表物質而發出，自然也是跟着物質而收回。譬如前段所講的米商，向銀行借得鈔票去辦米，那米運到北京，陸續賣出買米的人，用的都是鈔票；米商一面將米出售，一面收進鈔票；積有成數，便送到銀行償還借款。銀行一面取消借款，一面取消兌換鈔票之義務，不消費力，鈔票已經收回庫裏了。所以凡爲正當營業所發之鈔票，儘有自放自縮之能力，並不假手於現洋。因爲鈔票所代表的並非現洋，乃是社會有史以來所產的

財富。人類一日存在，財富一日不減，那麼鈔票便一日不會失去價值，現洋之有無多少，簡直可說沒甚關係。』

馬先生這段話，把鈔票性質講得十分明瞭，此外還有些學理談，不必多引了。簡單說：鈔票本非代表現洋，所以雖無現洋準備，他的價值原不會失。然則爲甚麼要準備呢？全然是時間的關係。因爲銀行放給米商的債權，是要一個月或三個月才能收回；銀行對於持有鈔票人債務，是要見票即付。所以總要存些現洋，預備着債權未到期之時，可以應付零星債務。鈔票準備金的作用不過如此。所以有三成以上足足穀用，明白這種道理，便可知像天津中國銀行有五成以上的準備，真算穩當到十二分。又可知那四成多沒有準備，乃是天經地義。你若是要連那四成多都叫他拿出現洋來，那麼，無論那一國的國家銀行，沒有過不倒的呀。

我們市民因爲沒有這種常識，所以每每將現洋和鈔票分爲兩概。他們外國人只有在國際滙兌上纔發生現洋和鈔票比價問題，我們這問題在國內動不動就發生。須知你只要按部就班行使那公認的鈔票，你的財產再不會損失。卻是鬧甚麼拒收咧，擠兌咧，鬧下來自然會鬧到鈔票價值低落，鈔票低落，銀行倒沒有甚麼關係，自己卻喫了大虧了。因爲鈔票是代表你的貨物，鈔價落到八折你那一斗米便虧二升，落到六折，你便虧四升。倘若越鬧越大，鬧到秩序不能維持，你那貨物或是銷不出去，甚至被焚被搶，那就價值全部損失了。所以我說他是自己和自己過不去。我希望我們市民要立刻有十二分覺悟，不要中了外國人毒計。銀行方面，能立刻撤銷限制兌現，自然是極好。就令一時未能，我們也應該原諒他，爲自衛計不得不然。只是我們鎮定一鎮定，他自然會恢復原狀，我們何苦直接去擠他，間接來擠自己呢？

這都是講的現在的覺悟，至於將來的覺悟，今日時候不彀，只好略說幾句罷了：

我們經過這幾天驚慌得了一種極深切的教訓。什麼教訓呢？就是我們今日纔知道：『政治咧，金融咧，和我們切身利益有這麼大的關係！』你看，輕輕地這點謠言，不是幾乎鬧得幾百萬人連飯都沒有得喫了嗎？雖然是由於別人陰謀煽陷和我們的無故自驚，也是因為政治和金融有種種不安的資料，纔能弄出這些虛驚。倘若不把這種不安資料根本剷除，恐怕這種風波，不到幾時，又要再起。所以我勸市民們一面要拿現在的覺悟把目前的風潮平下去；一面還要拿將來的覺悟把我們衆人託命的金融機關切實監督整頓起來。據我所想，有最重要的三件事：

第一件：由市民要求政府將發行鈔票權歸到唯一的國家銀行那些。

野。鷄。鈔。票。」一。概。收。回。不。得。再。發。

第二件：由市民要求發行鈔票之國家銀行照依外國通例，每一星期將鈔票流通額及準備金額公布一次。

第三件：由市民要求全國金融界當國民監督財政機關未成立以前，絕對的不許再借一文錢給政府。

這三件事的理由，今日不能多講，其實也是自然之理，不必多講。但我還要向大家切實叮囑幾句：我們向來打的『關起大門，不管事』的主意，如今是打不成了。你不管了，會有禍事落到你頭上來。你說不管，你身上帶着幾塊錢，預備今晚糴米買煤，隔着幾點鐘，米也糴不出，煤也買不出，你立刻就要綁着肚子餓！我看你還是管還是不管？唉！市民啊！你若老是這種不管事的壞脾氣，我且不必說什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這些廢話，老實說不是頑意兒！那

市民與銀行

餓鬼來光顧人，怕沒有什麼客氣哩！

無槍階級對有槍階級（十一月十二日北京國立
法政專門學校公開講演）

學校裏的講演，應該是討論學術，我忽然拈出『無槍階級對有槍階級』這
個怪題，像是很不該。但我想：所謂學術者，並不是專記誦那死的學理，還要兼
研究那活的實際問題；我們無論對於那門學術，總應該採這種態度。法政學
校學生的態度該怎樣呢？自然是要應用法政學理來解決法律上政治上經
濟上種種問題，遇有這類目前切要問題爲國人所急欲解決而未能解決者，
我們便應該從四方八面想出個解決方法供國人採擇，這是法政學生應有
的特別責任。現在的中國，人民厭苦兵禍，可算得全國人心理所同然，但是苦
無救濟之法。質而言之，裁兵問題，便是關於我們個人生死國家存亡最痛最
切的問題。今天所講，就是把我個人對於這問題的意見，提出來請教諸君。我
講演之前要先聲明一句：我的話絲毫不含煽動性質，我是完全拿學者的態

度來討論政治學上的實際問題。我確信這問題是我們應該討論而且人人都有權討論的。

全部西洋史，一言以蔽之，可以說是「階級鬥爭史」。他們的階級有種種分野：或是奴隸對市民，或是平民對貴族，或是貴族對皇族，或是原住人民對外來征服者，或是外來僑寓者對原住人民，或是這教對那教，或是一個教裏頭這派對那派，……雖然名目繁多，情形各各不同，但裏頭有一個共通的現象：是一邊由統治者形成一個階級，極其專橫，一邊由被治者形成一個階級，極其困苦。困苦到無路可走，便聯合起來要求解放。本來那統治階級是強者，被治階級是弱者；雖然，統治階級總是少數，被治階級總是多數；多數的弱者聯合起來，便會變強。所以他們所要求的解放，無論經多少波折，早晚終須有一天達到目的。所以每經一次階級鬭爭，那政治便一次從少數人手裏解放

到多數人手裏。如是由少數而多數而大多數而大多數而全體，便是政治的極軌，也是政治進化一定的程序。但這裏頭有最緊要的一個條件，是要那弱的階級自覺和努力。若離卻這個條件，那解放是永世不能得到的。

歐美人的階級分野，屢屢變遷，好像戲臺上唱的「過昭關」闖過一道城門再闖第二道城門。如今他們是無產階級對有產階級的時代了。他們這齣戲唱得好熱鬧啊！連我們站在對岸的，也跟著搖旗吶喊助興！依我看：這是他們階級的分野，我們還駁不上這分野；這是他們目前火燒眉毛的問題，我們還要隔好幾層再說到這問題。他們的有產階級的確是統治者，無產階級的確是被統治者。無產階級的困苦，的確是專由有產階級害了他們；他們若能從有產階級手裏得着解放，他們的問題便算解決。我們不然，我們有產的人本來就不配成一個階級。就勉強算他個階級罷，他們絕對的不配當統治者。那

統治者與其說他是有產的人，毋寧說他是無產的人。——最少也是本來無產的人，因據着那統治者地位，纔漸漸變成有產。或者是靠着許多無產的人擁護他，他纔變成有產。——無產的固然是被壓迫受困苦，有產的也是一般的被壓迫受困苦，所差不過程度問題。無產的把有產的打倒就算解放了嗎？咳，不能不能。因為這繩子的結不是在這裏。所以我國有產階級對無產階級這問題，我雖然確信將來必要解決，但現在說這些話，純然搔不著癢處。我國目前生死關頭，只有無槍階級對有槍階級一個問題。倘若這個問題解決不下來，那麼，別的問題任憑你說得天花亂墜，可都是白說了。

我想諸君應該質問我：『你這題目先就不通！階級如何能穀拿有槍無槍來分呢？』不錯，連我也覺得不通。無奈眼面前事實的確如此，諸君只能怪事實不通，不能怪我的題目不通。原來兵是人民做的，今天是個民，明天就可變成

個兵，今天是個兵，明天也許變成個民，這其間有什麼階級呢？雖然，正因為本來不應分階級的人，給他兩個對待的名稱，他自然會變成兩個階級。要而言之，一國裏頭，若是有一部分人專拿兵來當作職業，那麼，有槍階級和無槍階級，自然會劃出一個大鴻溝來。這鴻溝顯露之後，若不設法塞住，結果非鬧至人民死絕國家亡掉不止。羅馬當共和時代及帝國初期，武功總算震古爍今了，但除卻平民之外，並沒有叫做兵的這個階級。到了末年，行傭兵制，兵的階級立刻發生，鬧了好些年，畢竟把西羅馬整個送掉了。唐朝行府兵制的時候，六百三十四個折衝府，每一個府的兵，從千二百人起到八百人止，個個成年的民都是兵，個個兵放下槍都是民，當然沒有什麼階級。後來邊將屯防的「職業兵」漸漸發生，便有安史之亂，跟着十幾個藩鎮鬧得烏烟瘴氣，結果是兵的階級與國家同歸於盡。像羅馬的傭兵，唐的藩鎮，難道說他不算一個階

級嗎？不幸我們中國現在階級的分野，正在往這條死路上行。諸君試把古今歷史比較一比較，當信我標立這名目並非杜撰了。

這種不祥的階級怎麼會發生呢？諸君須知：天下的壞事，出面來做的雖然只有幾個人；從後臺裏直接間接有意識無意識來養成的，實不知若干千萬萬人。說到這裏，不能不追述革命以來的歷史。你想：革命是誰的事呀？革去一個專制的舊國，建設一個「德謨克拉西」的新國，自然該由全國人民自覺自動的去革他去建他。你看歐洲各國革命，那一國不是由「人民運動」得來？我們怎麼樣呢？說來又是慚愧，又是可憐！我們豈但穀不上說「人民運動」，並且穀不上說「運動人民」。我們僥倖成功，不過靠的是運動軍隊運動土匪！諸君啊！諸君也不能怪當時的革命家，好好的人民沒有一個肯攏邊，叫他們有什麼法子想？不用這種手段，能穀把滿清推倒嗎？却是宇宙間的

因果律，從來不會饒人！一般人民十年前消極的種下那惡因，今日却要積極的捱受這惡果。人民運動或運動人民成功的革命，那政治自然會建設在人民的基礎之上；運動軍隊成功的革命，那政治安能不建設在軍隊的基礎之上？運動土匪成功的革命，那政治安能不建設在土匪的基礎之上？上年復一年，你革我，我革你，革了又革，人民是拿着老主意一概不管，任憑他們幾十個大頭目帶領些大小嘍囉頑把戲，鬧到南南北北幾百萬「軍隊的土匪」與「土匪的軍隊」攪成一塌糊塗，他們的罪惡，已經是千夫所指，更無庸我再添一句半句話。但諸君不要忘記：這種罪惡當事的人固然居一大半，旁觀的人最少也分一小半，誰叫你一直縱容他縱容到這步田地呀？平心而論，這些頭目裏頭，也未必絕對的沒有一個好人，可惜是總脫離不了中國舊腦筋，總覺得要有多少扛槍的人站在我背後，纔能施展我的抱負。他的抱負如何且不必問，

卻是這種辦法，只能說他整個是「蠻拿基」，那裏還有一分一毫「德謨克拉西」氣味來？就拿區區小子說罷——我卻穀不上當頭目先要聲明——便也曾被這種舊腦筋纏縛多年，到如今醒悟過來，除了痛自刻責痛自懺悔外，別無話說。然而現在在臺面上活動的人，恐怕百中之九十九還在做這種夢哩！好的人尚且如此，那壞的更無從說起了。一方面那些野心家或是熱心家日日只想擴充力量好來管轄人，一方面那些良善人民，只有拜天念佛希望得著個把好人來管轄自己。這種思想，都是和我們招牌上所寫的民國兩個字背道而馳。兩方面湊合起來，於是鬧成現在有槍階級和無槍階級相對待的局面。諸君試從頭細想，我這話可不錯嗎？

舊話不必提了，眼面前逼到山窮水盡不能不解決的，便是裁兵問題。這個問題，已經成了天下公論，任憑什麼人，肚子裏縱然幾十個不願意，口頭上也一

字不敢駁回。那必要解決的理由，更不必我來分說了。現在只賸下一句話，就是「兵有什麼法子能殺我？」試隨便拉一個人來問他，大約不外以下三種解答：第一，是希望擁兵的人自己去殺。他們若肯激發天良，忽然幹這一回事，那麼，真是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我們只有香花供奉。你想配嗎？雖至愚極蠢的人，諒來也不會再做這種迷夢。第二，那麼，只好希望南方也好，北方也好，但求有一位「首出」的「聖神文武」，「一戎衣而有天下」，那時候便好。「放馬歸牛」，「淨洗甲兵長不用」了。呵呵！果然有這一日，真是「如天之福」。只可惜紙上的餅，不能拿來充肚裏飢。只有睜白眼看著北方唱一齣南征，南方便添了幾十旅；南方唱一齣北伐，北方便又添了十幾師。等他們再對唱得幾回，只怕全個中國只有兵沒有人了！第三，既然如此，沒有指望，只好望外國人來替我們殺。哎！痛心呀！痛心！我真不料神農黃帝會生下這樣

的子孫，連這種沒長進辱沒先人的話都講得出口來？我覺得國民若起了這種心理，那麼，國家纔真是無藥可醫，這病症比諸不能裁兵，只怕還深幾十倍哩。也罷，果然人家肯替我們裁，裁又裁得下去，你這話猶自可說。我老實告訴你罷：現在有槍階級的老爺們不比從前，瞪一瞪幾雙綠眼睛嚇他們不倒。除非外國派大兵來駐防。外國派大兵來駐防，中國成了個什麼東西，姑且不管，你想有這回事嗎？

這樣講來，那三種解決法，到頭只落得一個空！然則怎麼樣呢？我們只好隨他，得過且過。好嗎！若還過得下去，我們也不必討論這問題了。學校斷了經費，看我們的先生怎麼過法，我們的學生又怎麼過法？衙門不發薪水，看我們做官的怎麼過法，鈔票兌不出錢，看我們一切人等怎麼過法？這兩年來住在高陽，通州，武穴，宜昌……等處地方的人，問他怎麼過法？這五年來住在岳州，醴

陵重慶成都自流井叙州畢節長安三原油頭江門梧州……等處地方的人，問他怎麼過法？逃難跑到香港上海天津等處地方，當光賣盡問他怎麼過法？眼看着不到兩年，全國都是這樣景象，問你怎麼過法？就算裁兵有希望我們將來的日子怎麼過法，還是問題，倘若兵不能裁，只怕我們更沒有日子可過了。

望是沒有指望，過是過不下去，怎麼好呢？唉！還是自己靠自己罷，還是自己救自己罷。我爲說話方便起見，請假設兩個代名詞：有槍階級算是「他們」，無槍階級算是「我們」。關於裁兵問題，「他們」和「我們」是利害不兩立的。「他們」很強，「我們」很弱。自然只有「我們」怕「他們」，沒有「他們」怕「我們」；只有「他們」支配「我們」，沒有「我們」支配「他們」。話雖如此說，還請回頭一看：幾十年前歐洲的貴族不是很強，平民不是很弱。

嗎？貴族向來不怕平民，爲什麼後來竟自怕起來了呢？現時歐美日本的資本家不是很強，勞動者不是很弱嗎？資本家向來不怕勞動者，爲什麼近來也竟自怕起來了呢？這個燈謎猜破了，實屬平淡無奇，不外是凡強者階級人數一定少，凡弱者階級人數一定多。弱者階級散開了，成爲逐個逐個的「我」，便是天下之至弱弱者階級，合攏來成爲一個「我們」，便是天下之至強。「我們」第一件要有痛切的感覺，覺得兵若不裁，「我們」早晚總是不得了；第二件要有明確的信念，信得過「我們」，若不自己設法裁兵，兵是永遠不能裁。那麼「我們」何妨試一試，組織個

國民廢兵運動大同盟

看看「我們」力量如何？「我們」別的政治問題都暫且不管，專畫出一個時期來辦這件事。「我們」對於別的事或者彼此利害衝突，對於這件事敢

斷言沒有衝突。「我們」各人都是因爲要救自己，纔辦這件事，自然各人會各自想出法子來。「我們」應該聯合辦的事就聯合着想法子；「我們」應該單獨辦的事，就單獨著想法子。金融界裏頭都是「我們」，自然有金融界的法子；一般商店裏頭都是「我們」，自然有一般商店的法子；鐵路裏頭都是「我們」，自然有鐵路裏的法子；兵工廠裏頭都是「我們」，自然有兵工廠裏頭的法子；電報局郵政局裏頭都是「我們」，自然各有各有那裏頭的法子；鄉村裏頭耕田的都是「我們」，自然有鄉村裏的法子；學校裏頭教書的讀書的都是「我們」，自然有學校裏頭的法子；衙門裏頭辦公的都是「我們」，自然有衙門裏頭的法子；還有一句最要緊的話：「他們」裏頭其實什有九都是「我們」，自然會從「他們」裏頭想法子。什麼法子呢？「我」是不知道，要「我們」纔知道。但我知道的「我們」打是打不過「他們」，「我們」罵

是罵不過「他們」。我所又知道的：「我們」決定能穀轉移「他們」，「他們」終久都要變回「我們」，「他們」都變回「我們」，那時候兩個階級都消滅，連這問題也都消滅了。

我也明知道這件事並非容易辦，辦起來不知要經多大的波折，要出多大的犧牲。但我要問一句：我們還打算做共和國的，人民不打算做要做共和國的人民，國家的事卻一概不管，這樣子做得成做不成？我們既已生今之世爲今之人，就是不愛管事，迫著也要管事，就是不會管事，也得學學管事，換一句話說：總要把幾千年來，孤獨睽離的生活蛻變一下子，常常找個機會來練習練習協同動作的生活。苟非如此，我們這個國斷斷不能再生存在這世界上，我們這個人也斷斷不能再生存在這個國裏頭。像國民廢兵運動這件事，題目如此其簡單明瞭，全國人心理對於他如此其一致，倘若連這件事都不能協同

動作，還講別的事嗎？果然如此，我們只算是沒有做共和國民的可能性，只好再出個把皇帝等著來做他臣僕，或者歡迎些外國主人進來，等著替他們當奴才。我希望我們不是這樣纔好。

我這個題目算講完了，還有一段話，請諸君特別注意：當民國成立前後幾年間，法政總算是最時髦的學問。除國立各校外，私立的法政專門大學等等，差不多有十幾家，學生也是愛學法政的人占大多數。那動機也無庸爲諱，恐怕有一半是出於想做官的心理。如今是學生的自覺心大發現了，不惟人人知道官沒有什麼做頭，而且都覺得做官是一件極可恥的事。這種現象，不能不說是進化勇決的表徵。但反動的結果，便不知不覺，連法政這一科學問，也漸輕蔑起來，厭惡起來。社會上因爲政客成了個壞名詞，便相戒不談政治；學生因爲知道想做官是可恥，便遲疑不肯學法政。這不能不說是近兩三年來

一種社會病態。你想！人民沒有法律觀念，沒有政治智識，共和國的基礎建設在那裏呢？現代的青年，倘若人人都輕蔑法政，厭惡法政，將來這種觀念這種智識，靠什麼人灌輸到社會去？現在有槍階級的政治，我們信得過他不久定要消滅；消滅之後，自然是「德謨克拉西」的政治，為時代當面迫切之要求。倘非有普及完全新穎豐富的法政教育，這種政治能彀成立能彀持續嗎？諸君在一般青年公共的使命之外，還帶有這一項極尊嚴的特別使命。我希望諸君一刻都別要忘記啊！

續論市民與銀行

(十二月十七日北京朝陽大學經濟研究會公開講演)

當中交擠兌風潮初起時，我曾標「市民與銀行」這題目講演過一次，說市民對於銀行，應該有兩種覺悟，一是目前的覺悟，二是將來的覺悟。所謂目前覺悟者，指擠兌之無謂；所謂將來覺悟者，指市民應該監督銀行。當時正在風聲鶴淚的時候，對於第二段未便暢所欲言。現在金融界總算已經蘇生了一半，我們痛定思痛，不得不急起直追，作亡羊補牢的計畫。貴大學經濟研究會會員諸君，對於此等實際問題，諒來研究有素，我所以將這個題目再行提出，和諸君討論請教。

這回風潮當中，市民總算對得起銀行了。學生是到處講演商會和各商店是極力維持，居然把一場絕大風波，漸漸平息下去。我如今却要問：銀行到底對得起市民不曾從前怎麼樣啦？目前怎麼樣啦？將來又怎麼樣啦？從前呢，何消

多問孔子說得好：『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這回風潮雖說是政府財政的影響，上海投機事業的影響，乃至某類某類人挑撥的影響，原因異常複雜；然而銀行當事人，安能逃避責任？空穴來風，理有固然；銀行自身若是無懈可擊，何至一牽動便牽動到這樣狼狽呀？所以他們過去的罪戾，除了該向市民痛切引咎力圖洗贖之外，別無話講。目前呢，風潮還未完全平息，他們頭痛醫頭，脚痛醫脚，只好隨他枝枝節節對付過去，以觀後效。卻是將來啊！擔驚受怕，爲日方長。『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自可，四摘抱蔓歸。』倘若這種不祥的事件再鬧一兩回，我們小百姓可真攔不住了！我下文說的幾件事，雖然是很普通很陳腐的話，却是往後金融界生死問題。我遇着機會，也常常向他們銀行中人苦口忠告。但諸君須知：有權威的總愛濫用，算是人類公共惡根性；若沒有人拿鞭子跟在後頭，那劣馬斷沒有範我馳驅的。

道理。市民若依舊持那種老不管事的態度，恐怕將來喫苦頭的日子還多着哩。我有許多話，不願意向銀行家說，但願意向市民說。因爲這些話，奉行的責任雖在銀行家，發動和維持的力量，實全在市民。

我以爲市民對於銀行家有應該要求或制止的五件事：

第一：宜絕對的拒絕停兌，且事前偵察之防止之。中行當洪憲停兌時，各分行一致抵抗，叫中央稀爛的金融狀況，傳染不到地方上去，算得金融界極可紀念的一件事；這回擠兌，該行不久就準備完竣，現在已經是無限制兌現，我們市民拿他經過的歷史看來，大概還可以放心。所以停兌不停兌，不是兩行公共問題，恐怕是交行單獨問題。聽說交行現正趕緊籌備，快就有解決方法，果然如此，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但我們總須要求他快點給個准信，若鈔票長此靠着軍警強制行使，卻斷非市民所能忍受。若他自身

解決不了，我們就不能不責備銀行公會。交行自身有無覺悟，銀行公會有無準備，這都是我們市民應該過問的，因為市民是他的債主，很有這個權。還有一件事須要緊緊防備着：恐怕這窮極無聊的政府，忽然要蠻幹發出什麼「不換紙幣」來，我們可真不得了！我這話並非有什麼特別消息，不過這幾年來上這種條陳的人確也不少，現當山窮水盡的時候，難保他們不走上這條死路。須知不換紙幣，在歐美各國到萬不得已時，偶然施行，已經沒有那回不感極大的苦痛。人家是法幣的效力遍及全國，問題僅在國際匯兌上，那苦痛已經受不住。何況我們是號令不出國門一步，若把這些不換廢紙源源不絕發在城圈子裏頭，換煤換不成，換米換不着，只好幾百萬人活活餓死了。所以我警告市民，頭一件要監視他們防備這一着。

第二 宜要求發行權統一。鈔票發行權應該統一，是淺而易見的道理，不

獨歐洲諸國採用「單一發行制」的爲然，即採用「多數發行制」的美國，這個權還是統一。他們的制度，凡稍有經濟常識的人都知道，不必我徵引了。我們的制度，說他多數又不是，說他單一又不是。提起中央銀行，就聯想到「中交」這名詞，「中」「交」這名詞，却是兩個，不是一個。此外還有什麼匯業什麼邊業……等等，都是有發行權的銀行，那權都是不相統屬，漫無限制，這種怪現象，除了我們貴中華民國，真找不出第二個來。我們須知道啊！金融界的情狀，像一個緻密的網，一個網眼出毛病，便全副都惹起破綻來。遠的不必說，就論這回中交風潮罷，中法擱淺，就是間接重要原因之一種。我們受過這種教訓，總該有些覺悟了。所以根本改正發行制度，統歸於一，以便國民確實監督，真是目前整頓金融第一切要的問題。

第三：宜規定幾個準備市，將準備金集中，每日把數目公開，按比例發行鈔

票。發行銀行不將準備金和鈔票數目公開，鬼鬼祟祟的要發多少便發多少，這也是我們貴民國獨有的習慣，全世界找不出配腳來。交通嗎，不惟我們市民莫名其妙，恐怕連股東所知道的也不見得比我們多得多。中國嗎，稍好些我們在報紙上算是每年一回看見他股東會報告的帳目。普通銀行的營業固然可以如此。至於發行鈔票這部分的事業是金融界一個寒暑表風雨表，日日不同刻刻不同，你想天下有一年報告一回的寒暑表……豈非笑話？還好，聽說中行方面，每星期的公開報告要實行了，我們市民還要切實監督他，從此不許他中斷；還要由商會或者其他團體組織個監視機關，看他有無謊報。此外別的「野鷄鈔票」呢，據發行統一的原理，當然不能許容他繼續存在，但統一既未能立刻辦到，若聽他們絕對自由，怕將來亂子還多着哩。倘若市民躲懶，不肯注意監視，啊啊等着第二回

吃苦罷。

這一段論準備金額公布之必要，爲什麼先提出準備市這個條件呢？因爲一國的現金總要集中，然後調劑金融纔有實力。歐洲單一發行制的國家不必論，就講美國罷。從前準備金分置各州，感覺種種困難，近來陸續集中到幾個大市，「準備市」這個名詞，原自美國發生出來。論學理本來已該如此，按照中國現在情形，更感這種辦法之必要。內地軍閥如虎，土匪如狼，銀行把那白團團的東西放在庫裏頭，實在萬分危險。況且一般人民在這種不安全的環境之下，刻刻自危，得着塊把現洋，非趕緊埋在地底不可。這樣下去，可以全國鬧到無籌碼可用救濟方法，只有將現金集中在天津上海等處幾個大碼頭，內地却專靠鈔票當籌碼。問：「這樣辦法，豈不是內地不兌現嗎？」是呀，不錯。『那麼，同不換紙幣有什麼分別呢？』咳！截然不同。

『因爲內地需用現洋，不過爲滙往各口岸辦貨之用。只要是平價滙兌，那麼，要現洋的時候，自然會匯到外邊兌現。只要外邊準備市的現洋確實可靠，鈔票自然不會發生問題。我們市民須要明白這種辦法是最安全的最經濟的，要設法責備銀行實行他，從此對於內地鈔票，絕對不要再鬧擠兌風潮，對於準備市的準備金，却嚴重監督一點不放鬆，那麼，金融界就可以漸漸上軌道了。』

第四：要把發行職務和普通營業分清界限。稍治銀行學的人都該知道英倫銀行營業範圍制限極嚴，除了和各銀行往來拆息外，別的生意都不做，又該知道該行的營業部和發行部是絕對分離。別國的中央銀行，大概都是如此。爲什麼要如此呢？頭一件，因爲中央銀行是「銀行的銀行」，他若和普通銀行做同類的營業，便不能完他的職責。第二件，因爲中央銀行

有發行特權，營業若沒限制，就容易生出流弊。我們怎樣呀？像中交兩行，說是中央銀行嗎？他們的營業範圍種類，和一般商業銀行毫無分別。說是商業銀行嗎？他們却有發行權。不但如此，他們發行與營業攪成一團。這種辦法，便饒他鈔票準備金日日公開出來，我們還是信心不過。爲什麼呢？因爲活期存款和鈔票性質一樣，你說的你有若干成的準備金，安知不是拿甲的裙蓋乙的腳呢？就讓你們生意做得很穩當，制度也不應如此。何況你們簡直是一個大衙門，每年開銷，起碼是百打百萬，你營業的贏虧誰又管得呢？所以我們應該要求那擔任中央銀行職責的銀行，叫他打量打量他自己的身分，改正營業範圍，就令一時辦不到，也須把營業和發行界限分清，讓我們的公衆監督權，易於行使。

第五：要責成各銀行不許濫把錢借給政府，別國政府借錢，總是用公債

形式，公債是要經國會通過種種嚴重程序。連國庫證券也是如此。再沒有像我們貴民國把銀行當做外府，安心要「予取予携」甚至部裏頭的人自己開銀行，向政府重利盤剝。記得我從前在財政部的時候，雖沒有力量把以前積欠償還，卻也會用公事向中國銀行定出一種透支規則，鑿個四方孔來限制自己。自己任內，不敢拖欠銀行一個大錢。我非不知貪圖方便，但覺得不是如此，必至政府銀行兩敗而俱傷。這幾年來的內情，我也沒有工夫去細細過問，但那一場糊塗情形，人人都可以想見了。現在銀行帳簿上是年年賺錢，按起實際來，不過賺得政府一筆空帳。吸收人民幾百幾千萬脂膏，雙手獻給政府，政府破產，累得全社會跟着破產。政府盜竊的罪惡，難道銀行不該分一半嗎？前事說來，也是無益往後，銀行再有這種舉動，我們市民真是「人人得而誅之」了。

以上所說，是專就國家銀行方面立論，因為他是金融的總神經系，非把他弄好了，別的事都無從說起。噯！我們市民啊！我們受了幾千年來祖宗遺傳的根性，總覺得越少管閑事，自己越舒服越安全。那裏知道你生的時候不同，想要學那上古人『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的過日子，可是沒有了。好好鑿一個井，有人會把你的水攪渾；好好耕一塊田，有人會把你的穀擡走。攪過了，擡完了，你還睡在鼓子裏做夢哩。你要不管嗎？『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任你幾百萬家私，金融界一個亂子鬧出來，你立刻便會成個光蛋；你拿着三兩塊錢，指望他今日明日糶些米養活家口，金融界一個亂子鬧出來，你就會全家餓死。你還要知道，金融界的命脈，和財政是分不開的，財政的命脈，和一般政治是分不開的。惡政治一個波浪沒頭沒臉的打來，直打得你片瓦不存，葬身無地。老實告訴你罷，生在今日的人，若要不管政治，你就別想再活得成！

管政治不是一時就能管的，也不是一時就會管的，我們何妨先挑一兩件事學着管管？那麼，學管那件最緊要呢？我說：請先行管一管金融。市民啊！你別要把你自己力量看得太輕了。一個月以前他們這條命，是你救轉來。你既已救得他，你就管得他。你若不管他，恐怕終須有一日他倒來要你的命哩！

我這段話算講完了，對於今日在座學生諸君，還另外有些要求：我前幾天和孟祿博士談天，有幾句話最令我感動。他說：『中國官僚腐敗的罪惡，無論那種社會都傳染到，最是可怕。據我看，實業界乃至教育界都傳徧了。』他又說：『撲滅罪惡唯一的方法，就是把罪惡公開。今日中國的大患，是罪惡都隱藏起來，社會上沒有人知道他底細。』我想：諸君立這個會，目的不是在研究經濟嗎？諸君諒來都知道研究學問，不但是研究學理，最要緊是研究問題。我卻要添上一句：問題不是研究空的，是要研究實的。倘然會中有人提議，『我們

要研究井田可行不可行，怎麼個行法？有個不鬧到哄堂大笑嗎？這也是經濟上問題，爲什麼惹笑呢？因爲這是周公孔子的問題，不是我們的問題。像歐美今日，八點鐘制呀，六點鐘制呀，第二國際呀，第三國際呀，馬克思呀，散德加列沁呀，基爾特呀，那樣應採，那樣可行，算是他們研究的主潮。我們的青年也跟着起鬨，連筆墨官司都不知打了多少場了。依我看來，和宋儒高談井田，簡直沒有什麼分別。我們非不知井田在中國過去經濟史上很有價值，但現在卻沒有閑工夫去替孟子商君分庭辯護。我們非不知社會主義在中國將來經濟界上要放光明，但現在卻沒有閑工夫去替那些共產黨集產黨吶喊搖旗。諸君都知道讀書要讀活書，別要讀死書，研究問題要研究活問題，別要研究死問題。卻還要知道：同是一部書，同是一個問題，在那時代那地方是活的，換轉別個時代別個地方會變成死的哩。諸君真要讀活書，研究活問題嗎？請

應用你所學得的學理，切切實實來研究中國眼面前的迫切問題。就拿今天所講的題目來作譬吧，諸君就該把銀行界過去的罪惡詳細調查，公開出來供社會指摘。該研究出一個改革的方案，叫社會要求實行。社會上不明白情形，你就該指導他；社會上沒有這勇氣，你就該鼓舞他。你若能像樣子選定幾個題目去下工夫，那麼，你自身對於學問，自然越發親切有味，你所學得的學問，也不至與社會完全隔離了。我想：不但經濟，無論做那門學問都該這樣做。請諸君垂聽啊！

「知不可而爲」主義與「爲而不有」主義

(十二月二十一日北
京哲學社公開講演)

建猷品青合記

今天的講題是兩句很舊的話：一句是「知其不可而爲之」一句是「爲而不有」。現在案照八股的作法，把他分作兩股講。

諸君讀我的近二十年來的文章，便知道我自己的人生觀是拿兩樣事情做基礎（一）「責任心」（二）「興味」。人生觀是個人的，各人有各人的人生觀。各人的人生觀不必都是對的，不必於人人都合宜。但我想：一個人自己修養自己，總須拈出個見解，靠他來安身立命。我半生來拿「責任心」和「興味」這兩樣事情做我生活資糧，我覺得於我很是合宜。

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對於我的感情都不肯壓抑，聽其盡量發展。發展的結果常常得意外的調和。「責任心」和「興味」都是偏於感情方面的多，偏

於理智方面的很少。

「責任心」強迫把大擔子放在肩膀上是很苦的，興味是很有趣的。二者在表面上恰恰相反，但我常把他調和起來。所以我的生活雖說一方面是很忙亂的，很複雜的；他方面仍是很恬靜的，很愉快的。我覺得世上有趣的事多極了；煩悶，痛苦，懊惱，我全沒有；人生是可贊美的，可謳歌的，有趣的。我的見解便是（一）孔子說的「知其不可而爲之」和（二）老子的「爲而不有」。

「知不可而爲」主義，「爲而不有」主義和近世歐美通行的功利主義根本反對。功利主義對於每做一件事之先必要問：「爲什麼？」胡適哲學史大綱上講墨子的哲學就是要問爲什麼。「爲而不有」主義便爽快的答道：「不爲什麼。」功利主義對於每做一件事之後必要問：「有什麼效果？」知不可而爲」主義便答道：「不管他有沒有效果。」

今天講的並不是詆毀功利主義。其實是一種主義皆有他的特點，不能以此非彼。從一方面看來，「知不可而爲」主義容易獎勵無意識之衝動；「爲而不有」主義容易把精力消費於不經濟的地方。這兩種主義或者是中國物質文明進步之障礙，也未可知。但在人類精神生活上卻有絕大的價值，我們應該發明他享用他。

「知不可而爲」主義是我們做一件事明白知道他不能得着預料的效果，甚至於一無效果，但認爲應該做的，便熱心做去。換一句話說，就是做事時候把成功與失敗的念頭都撇開一邊，一味埋頭埋腦的去做。

這個主義如何能成立呢？依我想，成功與失敗本來不過是相對的名詞。一般人所說的成功不見得便是成功，一般人所說的失敗不見得便是失敗。天下事有許多從此一方面看說是成功，從別一方面看也可說是失敗；從目前看

可說是成功，從將來看也可說是失敗。比方鄉下人沒見過電話，你讓他去打電話，他一定以爲對牆講話，是沒效果的，其實他方面已經得到電話，生出效果了。再如鄉下人，看見電報局的人在那裏兵兵，兵兵的打電報，一定以爲很奇怪，沒效果的；其實我們從他的手裏已經把華盛頓會議的消息得到了。照這樣看來，成敗既無定形，這「可」與「不可」不同的根本先自不能存在了。孔子說，「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他這句話似乎是很滑頭，其實他是看出天下事無絕對的「可」與「不可」，即無絕對的成功與失敗。別人心目中有「不可」這兩個字，孔子卻完全沒有。「知不可而爲」本來是晨門批評孔子的話，映在晨門眼簾上的孔子是「知不可而爲」。實際上的孔子是「無可無不可而爲」罷了。這是我的第一層的解釋。

進一步講，可以說宇宙間的事絕對沒有成功，只有失敗。成功這個名詞，是表

示圓滿的觀念，失敗這個名詞是表示缺陷的觀念，圓滿就是宇宙進化的終點，到了進化終點，進化便休止；進化休止不消，說是連生活都休止了。所以平常所說的「成功與失敗」不過是指人類活動休息的一小段落。比方我今天講演完了，就算是我的成功；你們聽完了，就算是你們的成功。

到底宇宙有圓滿之期沒有，到底進化有終止的一天沒有？這仍是人類生活的大懸案，這場官司從來沒有解決，因為沒有這類的裁判官。據孔子的眼光看來，這是六合以外的事，應該「存而不論」。此種問題和「上帝之有無」是一樣不容易解決的。我們不是超人，所以不能解決超人的問題。人不能自舉其身，我們又何能拿人生以外的問題來解決人生的問題？人生是宇宙的小段片，孔子不講超人的人生，只從小段片裏講人生。

人類在這條無窮無盡的進化長途中，正在發腳蹣跚而行；自有歷史以來，不

過在這條路上走了一點，比到宇宙圓滿時候，還不知差幾萬萬年哩！現在我們走的只是像體操教員剛叫了一聲「開步走！」就想要得到多少萬萬年後的成功，豈非夢想？所以談成功的人不是騙別人，簡直是騙自己！

就事業上講，說什麼周公致太平，說什麼秦始皇統一天下，說什麼釋迦牟尼普渡衆生。現在我們看看周公所致的太平到底在那裏？大家說是周公的成功，其實是他的失敗。「六王畢，四海一」這是說秦始皇統一天下了，但仔細看看，他所統一的到底在那裏？並不是說他傳二世而亡，他的一份家當完了，就算失敗。只看從他以後，便有楚漢之爭，三國分裂，五胡亂華，唐之藩鎮，宋之遼金，就現在說，又有督軍之割據，他的統一之功算成了嗎？至於釋迦牟尼，不但說沒普渡了衆生，就是當時的印度人，也未全被他普渡，所以世人所說的一般大成功家，實在都是一般大失敗家。再就學問上講，牛頓發明引力，人人

都說是科學上的大成功，但自愛斯坦之相對論出，而牛頓轉爲失敗，其實牛頓本沒成功，不過我們沒有見到就是了。近兩年來歐美學界頌揚愛斯坦成功之快之大，無比矣！我們沒學問，不配批評，只配跟着謳歌，跟着崇拜！但照牛頓的例看來，他也算是失敗。所以無論就學問上講，就事實上講，總一句話說，只有失敗的，沒有成功的。

人在無邊的「宇」（空間）中只是微塵，不斷的「宙」（時間）中，只是斷片。一個人無論能力多大，總有做不完的事，做不完的便留交後人。這好像一人忙極了，有許多事做不完，只好說「託別人做吧！」一人想包做一切事，是不可能的，不過從全體中抽出幾萬萬分之一點做做而已。但這如何能算是成功？若就時間論，一人所做的一段片，正如「抽刀斷水水更流」也不得叫做成功。

孔子說「死而後已」這個人死了那個人來繼續。所以說繼續繩繩，始能成大的路程。天下事無不可。天下事無成功。

然而人生這件事卻奇怪的很。在無量數年中，無量數人所做的無量數事，個個都是不可，個個都是失敗，照數學上零加零仍等於零的規律講，合起來應該是個大失敗，但許多的「不可」加起來卻是一個「可」。許多的「失敗」加起來卻是一個「大成功」。這樣看來也可說是上帝生人就是教人作失敗事的，你想不失敗嗎？那除非不做事。但我們的生活便是事，起居飲食也是事，言談思慮也是事，我們能到不做事的地步嗎？要想不做事除非不做人。佛勸人不做事，便是勸人不做人。如果不能不做人，非做事不可。這樣看來普天下事都是「不可而爲」的事。普天下人都是「不可而爲」的人。不過孔子是「知不可而爲」一般人。是「不知不可而爲」罷了。

「不知不可而爲」的人，遇事總要計算計算，某事可成功，某事必失敗；可成功的便去做，必失敗的便躲避。自以爲算盤打對了，其實全是自己騙自己，計算的總結與事實絕對不能相應。成敗必至事後始能下判斷的。若事前橫計算豎計算，反減少人作事的勇氣。在他挑選趨避的時候，十件事至少有八件事因爲怕失敗，不去做了。

算盤打得精密的人，看着要失敗的事都不敢做，而爲勢所迫，又不能不勉強去做，故常說「要失敗啦！我本來不願意做，不得已啦！」他有無限的憂疑，無限的驚恐，終日生活在搖盪苦惱裏。

算盤打得不精密的人，認爲某件事要成功，所以在短時間內歡喜鼓舞的做去，到了半路上忽然發見他的成功希望是空的，或者做到結尾，不能成功的真相已經完全暴露，於是千萬種煩惱悲哀都湊上來了。精密的人不敢做，不

想做而又不能不做，結果固然不好；但不精密的人，起初喜歡去做，繼後失敗了，灰心喪氣的不做，比前一類人更糟些。

人生在世界是混混沌沌的，從這種境界裏過數十年，那末，生活便只有可悲更無可樂。我們對於「人生」真可以詛咒。爲什麼人來世上作消耗麵包的機器呢？若是怕沒人吃麵包，何不留以待虫類呢？這樣的人生可真沒一點價值了。

「知不可而爲」的人怎樣呢？頭一層他預料的便是失敗；他的預算冊子上件件都先把失敗兩個字擺在當頭，用不着什麼計算不計算，揀擇不揀擇，所以孔子一生一世只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是事前猜度，「必」是先定其成敗，「固」是先有成見，「我」是爲我。孔子的意思就是人不該猜度，不該先定事之成敗，不該先有成見，不該爲着自己。

第二層：我們既做了人，做了人既然不能不生活，所以不管生活是段片也罷，是微塵也罷，只要在。這。微。塵。生。活。段。片。生。活。裏。認。爲。應。該。做。的。便。大。踏。步。的。去。做。不。必。打。算。不。必。猶。豫。

孔子說：「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又說：「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歟，而誰歟？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這是絕對自由的生活，假設一個人常常打算何事應做，何事不應做，他本來想到街上散步，但一念及汽車撞死人，便不敢散步，他看見飛機很好，也想坐一坐，但一念及飛機摔死人，便不敢坐，這類人是自己禁住自己的自由了。要是外人剝奪自己的自由，自己還可以恢復，要是自己禁住自己的自由，可就容易恢復了。「知不可而爲。」主義是使人將做事的自由大大的解放，不要作無爲之打算，自己捆綁自己。

孔子說：「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不惑就是明白，不憂就是快活，不

懼就是壯健。反過來說，惑也，憂也，懼也，都是很苦的，人若生活於此中，簡直是過監獄的生活。

遇事先計畫成功與失敗，豈不是一世在疑惑之中？遇事先怕失敗一面做，一面愁，豈不是一世在憂愁之中？遇事先問失敗了怎麼樣，豈不是一世在恐懼之中？

「知不可而爲」的人，只知有失敗，或者可以說他們用的字典裏，從沒有成敗二字。那末，還有什麼可惑可憂可懼呢？所以他們常把精神放在安樂的地方。所以一部論語，開宗明義便說：「不亦樂乎！」「不亦悅乎！」用白話講，便是「好呀！」「好呀！」

孔子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可見他作事是自己喜歡的，並非有何種東西鞭策才作的，所以他不覺鬍子已白了，還只管在那裏做。他

將人生觀立在「知不可而爲」上，所以事事都變成不亦樂乎，不亦悅乎，這種最高尙最圓滿的人生，可以說是從「知不可而爲」主義發生出來。我們如果能領會這種見解，即令不可至於樂乎悅乎的境地，至少也可以減去許多「惑」「憂」「懼」，將我們的精神放在安安穩穩的地位上。這樣才算有味的生活，這樣才值得生活。

第一股做完了，現在做第二股，仍照八股的做法，說幾句過渡的話。「爲而不有」主義與「知不可而爲」主義，可以說是一個主義的兩面。「知不可而爲」主義可以說是「破妄返真」，「爲而不有」主義可以說是「認真去妄」。「知不可而爲」主義可使世界從煩悶至清涼，「爲而不有」主義可使世界從極平淡上顯出燦爛。

爲而不有這句話，羅素解釋的很好。他說人有兩種衝動，（一）占有衝動，（二）

創造衝動。這句話便是提倡人類的創造衝動的。他這些學說諸君諒已熟聞不必我多講了。

「爲而不有」的意思是不以所有觀念作標準，不因爲所有觀念始勞動。簡單一句話，便是爲勞動而勞動。這話與佛教說的「無我我所」相通。

常人每做一事，必要報酬，常把勞動當作利益的交換品，這種交換品只准自己獨有，不許他人同有，這就叫做「爲而有」。如求得金錢，名譽，因爲「有」才去爲。有爲一身有者，有爲一家有者，有爲一國有者。在老子眼中看來，無論爲一身有，爲一家有，爲一國有，都算是爲而有，都不是勞動的真目的。人生勞動應該不求報酬。你如果問他「爲什麼而勞動？」他便答道：「不爲什麼。」再問「不爲什麼爲什麼勞動？」他便老老實實說「爲勞動而勞動，爲生活而生活。」

老子說「上人爲之而無以爲」韓非子給他解釋的很好「生於其心之所不能已，非求其爲報也。」簡單說來，便是無所爲而爲，既無所爲所以只好說爲勞動而勞動，爲生活而生活，也可說是勞動的藝術化，生活的藝術化。

老子還說「既已爲人已愈有，既已與人已愈多。」這是說我要帮助别人，自己却更有，不致損滅。我要給人，自己却更多，不致損滅。這話也可作爲而不有的解釋。按實說老子本來沒存「有」「無」「多」「少」的觀念。不過假定差別相以示常人罷了。

在人類生活中最有勢的便是占有性。據一般人的眼光看來，凡是爲人的好像已便無。例如楚漢爭天下，楚若爲漢，楚便無，漢若爲楚，漢便無。韓信張良幫漢高的忙謀皇帝，他們便無。凡是與人的好像已便少，例如我們到磁器舖子裏買瓶子，一個瓶子，他要四元錢，我們只給他三元半，他如果賣了，豈不是少

得五角？豈不是既已與人已便少嗎？這似乎是和已愈有已愈多的話相反。然自他一方面看來，譬如我今天講給諸君聽，總算與大家了，但我仍舊是有，並沒減少。再如教員天天在堂上給大家講，不特不能減其所有，反可得「教學相長」的益處。至若彈琴，唱歌給人聽，也並沒損失，且可使彈的唱的更加熟練。文學家，詩人，畫家，雕刻家，慈善家，莫不如此。卽就打算盤論，幫助人的雖無實利，也可得精神上的愉快。

老子又說『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赤子終日號而不嘎，和之至也』他的意思就是說成人應該和小孩子一樣，小孩子天天在那裏哭，小孩子並不知爲什麼而哭，無端的大哭一場，好像有許多痛心的事，其實並不爲什麼。成人亦然問他爲什麼吃，答爲餓。問他爲什麼餓？答爲生理上必然的需要。再問他爲什麼生理上需要？他便答不出了。所以「爲什麼」是不能問的，如果事事問爲

什麼，什麼事都不能做了。

老子說「無爲而無不爲」我們却只記得他的上半截的「無爲」把下半截的「無不爲」忘掉了。這的確是大錯。他的主義是不爲什麼，而什麼都做了。並不是說什麼都不做。要是說什麼都不做，那他又何必講五千言的道德經呢？

「知不可而爲」主義與「爲而不有」主義都是要把人類無聊的計較。一掃而空。喜歡做便做。不必瞻前顧後。所以歸併起來。可以說這兩種主義就是「無所爲而爲」主義也可以說是生活的藝術化。把人類計較利害的觀念變爲藝術的情感的。

這兩種主義的概念，演講完了。我很希望他發揚光大推之於全世界。但要實行這種主義須在社會組織改革以後試看。在俄國勞農政府之下。「知不可

而爲」和「爲而不有」的人比從前多多了。

社會之組織未變，社會是所有的社會，要想打破所有的觀念，大非易事，因爲人生在所有的社會上，受種種的牽掣，倘有人打破所有的觀念，他立刻便缺乏生活的供給。比方作教員的，如果不要報酬，便立刻沒有買書的費用。然假使有公共圖書館，教員又何必自己買書呢？中國人常喜歡自己建造花園，然而又沒有錢，其勢不得不用種種不正當的方法去找錢，這還不是由於中國缺少公共花園的緣故嗎？假使中國仿照歐美建設許多極好看極精緻的公共花園，他們自然不去另造了。所以必須到社會組織改革之後，對於公衆有種種供給時，才能實行這種主義。

雖是這樣說法，我們一方面希望求得適宜於這種主義的社會，一方面在所處的混濁的社會中，還得把這種主義拿來寄托我們的精神生活，使他站在

安慰清涼的地方。我看這種主義恰似青年修養的一付清涼散。我不是拿空話來安慰，諸君也不是勉強去左右，諸君他的作用着實是如此的。

最後我還要對青年進幾句忠告。老子說「寵辱不驚」。這句話最關重要。現在的一般青年或爲寵而驚，或爲辱而驚。然爲辱而驚的大家容易知道，爲寵而驚的大家却不易知道。或者爲寵而驚的比較爲辱而驚的人的人格更爲低下也。說不定。五四以來，社會上對於青年可算是寵極了，然根底淺薄的人，其所受寵的害，恐怕比受辱的害更大吧，有些青年自覺會做幾篇文章，便以爲滿足；其實與歐美比一比，那算得什麼。學問徒增了許多虛榮心罷了。他們在報上出風頭，不過是爲眼前利害所鼓動，爲虛榮心所鼓動，別人說成功，他們便自以爲成功，豈知天下沒成功的事這些都是被成敗利鈍的觀念所誤了。

古人的這兩句話，我希望現在的青年在腦子裏多轉幾轉，把他當作失敗中的鼓舞，煩悶中的清涼，困倦中的興奮。

外交歟？內政歟？

（十二月二十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平民教育社公開講演）

今日承平民教育社委託，有機會和諸君交換意見，不勝欣幸。所標講題，當先加解釋，我所要說的並非泛論外交內政問題。我的意思是：國民運動的方向，應該在外交呀？還是在內政呢？

我講演之前，還有對於平民教育社的一點意見：平民教育應該怎樣教育法呢？我想不外兩種：（一）從私的生活方面說，要教育他們學做現代的人。（二）從公的生活方面說，要教育他們學做共和國的國民。兩種是不能偏廢的。但無論從事於那一種，都不是用上講堂背講義的方法所能有效，最要緊是常常實地練習。譬如欲教成一個電車運轉手，自然非拿電車給他練習駕駛不可。想要教成多數人會做共和國國民，非常常造出些機會，叫他們養成政治上協同動作之觀念及技能不可。我所以極力提倡國民運動，就是此意。

本題所講，分爲七段：

- (一) 國民運動之意義及價值
- (二) 中國是否曾有國民運動
- (三) 「五四」之外交的國民運動
- (四) 今後國民運動之方向，外交歟？內政歟？
- (五) 內政的國民運動之重要條件
- (六) 現在國民運動應拿什麼爲主題？
- (七) 「我」自己應做的事

一 國民運動之意義及價值

近來社會上稍爲時髦一點的人，都喜歡用新名詞，却是許多好名詞，都被他們活活用壞了。卽如「運動」這個字，在中國一般人說起來都覺得他含有資

緣詭秘可厭可鄙的觀念。其實這個字是從英語 Movement 譯來 Movement 的本訓，何嘗有一毫像中國人所說呢？我如今先要把運動這個字下一個正當的解釋：好像把一鍋水燉到沸度，水中種種質點，都在滿鍋裏運動起來，現出變化作用。又像在化學室中，將幾種原素放在一個玻璃瓶內，他們便運動起來，分析化合忙個不了。這種物理學上運動狀態，很可以借來做人類社會運動解釋。社會是個有機體，凡有機體的生活，都是以構成他本身之分子的運動爲養命之源。倘若「構成分子」運動停息，那有機體便活不成了。例如人體中無數細胞，刹那刹那在那裏運轉，周而復始，這算是經常運動。若忽然疾病來侵，便於經常運動之外，更起一種非常運動：體中健全的細胞，便一齊著急，對於那些陳腐毒害的黴菌，施行攻擊或防衛。人類所以能保健却病，都是賴此。倘若有一個人，平時那血管運行，慳慳無力，遇着疾病，體中健全細胞

躲起懶來，害怕來，不肯或不敢和那些病菌對抗，這個人我敢說他不到幾天便要死了。國家的構成分子——國民，和人體的構成分子——細胞，正是一樣。國民當國家安寧的時候，要有繼續不斷的經常運動，然後政治上病的分子不至發生。國民當國家艱危的時候，要有急起直追的非常運動，然後內部發生或外部襲來之政治上病的狀態，可以減輕或消滅。若是國民都躲懶都害怕，運動力停滯或止息，那麼，這國家或是犯著一個險症，暴病而亡，或是害了癆傷，捱些時也斷送性命，這是萬無可逃的事理。這樣說來，國民運動意義之重大，可以想見了。

一部西洋史，一言以蔽之，就是國民運動史。希臘市府國家的市民 *Citizen*，對於全市——即國家大大小小的事，人人都有權管，人人都愛管。所以古代文明的源泉，都從那幾個斗大小城醞釀出來。羅馬人的國民運動，更是好看。

他們有一回最有趣的事：那平民和貴族對抗，忽然全體都跑往離羅馬城外十三里的小丘上去了，歷史上有名的叫做「退出國都」之役。貴族平時雖然是趾高氣揚，碰着這種運動，也不得不低頭了。因為統治階級權力雖大，卻被治階級却也活不成。強者能毅制弱者死命的，只有一件，弱者能毅制強者死命的，倒有幾十件哩。只要弱者能有團結的運動，至弱便變成至強。羅馬平民拿出他「看家本事」，唱過這齣有聲有色的活戲，此後二千多年歐洲政治舞臺演的都是這一套。自從近世之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經過法國大革命，直至現代之勞工同盟，戲本雖日日翻新，精神却是從一個源泉裏導引出來。我們讀西洋史，真是越讀越有趣，處處峯迴路轉，時時柳暗花明。只看見他們國家裏頭的細胞，好像「無事忙」一般，在那裏運動個不休。除宗教、學術、文藝上種種運動不計外，專就政治上說，那關於全部的，例如人權、宣言、運動、殖

民地獨立運動，民族建國運動，普通選舉運動，社會主義運動……等等。那關於局部的，例如放奴運動，婦女參政權運動，禁酒運動……等等。看他們鬧真鬧得起勁，真運動得興高彩烈，淋漓盡致。拿我們中國人眼光看來，真是莫名其妙。只好說是「囉唆」、「搗亂」、「多管閑事」、「幹嗎」！好像那些方領矩步的老先生們，看著你們學生賽打毬，兩邊成羣結黨，個個打得滿身臭汗，究竟所爲何來？殊不知你們每日或隔日打一次毬，便是身體保健的絕妙法門，比吃人參鹿茸還強幾倍！他們囉唆，愛管閑事，大至全人類的人權也要管，小至一家裏頭買個丫頭用用也要管，一個人愛吃兩口酒也要管，說聲管，便大吹大擂的糾合千千萬萬人管起來。他們鬧這種頑意，好像鬧上了癮，一天不鬧，便一天不好過。哈哈！他們真是瘋子嗎？國家的發展，全人類的進化，都是從這一個根子來哩。

我老實告訴諸君說罷：我們若不承認中華民國，——不承認生今之世要適用共和政治，那便無話可說。如其不然，便要知道共和政治的土臺，全在國民；非國民經過一番大覺悟大努力，這種政治萬萬不會發生，非繼續的覺悟努力，這種政治萬萬不會維持。倘若國民不願意管政治，或是不能管政治，或是不會管政治，那麼，這種國民只好像牛馬一般，套上個籠頭聽人處分。碰著個把聖君賢相，大家便過幾年安逸日子；碰著那強暴殘忍的人壓在上頭，只好隨他愛搶便搶，愛殺便殺。憑你把國體政體的名目換幾十躺招牌，結果還是一樣。你若想取得自由市民的資格，可是海枯石爛，不會有這回事哩！怎麼纔算願意管政治呢？是要靠國民運動來表示這意志。怎麼纔能管政治呢？是要靠國民運動來爭得這權利。怎麼纔會管政治呢？是要靠國民運動來練習這技能。簡單說一句，國民運動便是共和政治唯一的生命，沒有運動，便沒

有生命了。

歐美的國民運動，大概可分兩種：（一）法定的。（二）特別的。法定的是選舉運動：大總統若干年滿任，國會及地方議會若干年改選，每到這時候，嚶啾！可了不得！全國人都像熱鍋上螞蟻，動得個『不亦樂乎！』那些政黨首領，日日從早到晚十幾點鐘的演說，或在公共會場，或是露天，到處人山人海，在這個市講完，嗚嗚的搭火車飛跑到那個市，火車裏頭聚得一羣人也要演說，車站上停得十分八分鐘也要演說！那討論問題的小冊子，便像雪片一般飛滿全國！那些主張都寫著旗子，拿軍樂隊夾著遊行，便像南洋烟草公司賣告白一般！全國人民，除非閉著眼，眼一張，看見的便是政治問題；除非塞著耳，耳一開，聽見的便是政治問題。他們每隔一兩年，便做一躺這種法定的運動，好像鄉村裏定期迎神賽會，連七八十歲老太婆五六歲小孩子，都趁熱鬧大忙特

忙起來。他們平時像一鍋水保住平均的溫度，一到選舉時，更漲到沸度。他們鬧慣了也忘了形，不知是責任呀還是興味？依我看來，他們這樣的政治運動，簡直和賽球賽馬賽舢板的運動同一性質，真是無事忙忙到舉國若狂了。什怎是特別運動？大抵拿來要求某種應得而未得的權利，來處分某種應解決而未解決的問題。這些事在選舉運動時雖亦常常提出，但未必都能成爲選舉競爭的目標，未必都能成爲國會中討論的主題。他們於是乎出一特種階級——或一特種團體結合起來，舉行種種方式的運動，把他們所要求所主張擡出來，喚起一般人注意而促反對者之警省。他們在平時——或法定選舉時，已經爲不斷的努力。遇有機會，更臨時做刺激的運動。例如印度人乘英太子往遊，便大大的做一回反歡迎的運動。勞工階級每年五月一日，便大大的做一回國際紀念節的運動。這些運動多行一次，那主義的旗幟便加增

一度的鮮明。運動來，運動去，從前的空想，漸漸的都變成事實了。

這種運動，在人類政治生活上有什麼意義呢？依我想，最要的有三件：

第一：使多數人懂得政治是怎麼一回事，懂得什麼叫做政治問題。一般人的通患，莫過於腦筋裏沒有問題。無論在政治上，在學問上，在道德上，凡不用心思的人，總不會發生問題。件件事都覺得『照例如此』、『不成問題』。那麼全個社會都僵冷，都釘住，再不會改進了。運動的最大作用，是把各種問題大鑼大鼓的擡出來，放在公衆面前，聒噪得大家耳根不得清淨。初時那些渾渾沌沌什麼事都回答個『不成問題』的人，你向他聒噪得幾次，他腦筋裏也漸漸成了問題了。例如我好貪幾杯，覺得吃酒不成問題，倘使我住在美國，聽他們戒酒會中人種種科學的解剖說法，許不免我腦中也成了問題。凡一個問題經過一度羣衆運動之後，那問題自然會成爲「通俗

化。」例如美國從前曾經拿用金用銀問題來做兩黨競爭選舉的目標，難道美國市民個個都是經濟學博士嗎？自然大多數人對於這問題不惟不管而且不懂。但當那運動正劇的時候，差不多連掃街夫連竈下婢開口便是金銀本位的利害了。所以國民運動的作用，第一步是把向來不成問題的事項漸漸都變成了問題。第二步，是把向來少數人注意了解的問題，叫多數人都注意都了解。這便是政治智識普及國民的唯一捷徑。

第二：使多數人認識且信任政治生活之「改進可能性」。每一個時代的舊政治，總是被治階級呻吟於統治階級之下，統治階級總是強者，被治階級總是弱者。弱者因為力量來不及，只好聽天由命，只好盼望強者發慈悲赦免。二百年前歐洲的人民和現在中國的人民，都是如此。——中國人尤其——國民運動，是由少數弱者的自覺，喚起多數的自覺，由少數弱者努

力，擱成多數的努力。自覺努力的結果，強者階級必然降服，弱者階級定然得解放，你不試過不肯信，試得一兩回便信了。信得過這種種事業有「可能性」，自然政治生命當帶活氣。

第三：使多數人養成協同動作之觀念及技能。國民運動雖然也需有指導的人，但他的性質純是多數共動，不是一人獨動。譬如前幾天你們高師學生和清華學生賽球，倘使你們多數的隊員都沒有打球興味和技能，那麼，縱令你們隊裏有一位「球聖」兩三位「球賢」，我敢保你們終是一敗塗地。因為人類是社會的動物，除了互助協作外，斷斷不會做成一件事。要養成互助協作的習慣和技能，斷不是靠口頭提倡所能辦到。總須找些機會，常常作實地練習。國民運動，是拿很鬆很寬很暫的團聚試行協同動作。做過一次，那習慣興味技能便長進一次。所以緻密堅強之民治組織，非經

過多次運動而且常常繼續運動不能成功。

上文所說三項，第一項是從智的方面說，第二項是從意的方面說，第三項是從情的方面說。所以我覺得國民運動的價值，在政治本身是可限量的，在國民教育上是無可限量的。一個個政治問題的運動，雖有成敗之可言；從政治教育的意味看來，無成敗之可言。凡國民政治運動，總是成功——雖失敗也算成功。爲什麼呢？因爲靠他纔能養成做共和國民的資格。成固然養資格；敗也是養資格。資格養成，什麼事幹不了。所以國民運動只有成功，沒有失敗。

二 中國有過國民運動沒有

民衆政治的思想，幾千年來中國人腦裏頭是沒有的。「人存政舉」是我們祖宗相傳唯一的信條。所以古今大政治家，能做到「格君心之非」便是第一等事業。漢宋明各時代，也曾有所謂「民間清議」很像帶點運動色彩。然

而和歐美式的運動性質根本不同。漢明式運動最高的結果，不過希望君相幹好事；歐美式是要人民自己來幹。溥明式運動，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能把一個誤國權奸打下去，已算莫大的成功；但那權奸做壞事已做穀了，國家元氣已喪盡了。況且一個權奸打下去，別一位權奸又擠上來，始終還是那麼一回事。歐美式運動，是把政治築成一個壁壘，叫壞人混不進去。所以他們只有政策對不對的問題——政策本來沒有絕對的好不好——沒有人好不好的問題。就以人論罷，政府當局因才具不濟，要做好事做不來的，容或有之；安心做壞事——把國事弄壞來謀一己利益的人——却斷斷沒有。爲什麼呢？爲的是他們大大小小政策，都是從國民運動產生出來；當局的地位，是靠國民運動纔能得着；他們辦的事，不過執行國民運動的結果。國民幾千萬雙眼睛看着，那裏容一個人作弊；我們在「清議」極盛的時代，尙且不能得這種結

果，別的時代更不必說了。舊小說裏頭說的『一條好漢』最足表現中國人心理，無論好事壞事，總是靠一兩條好漢去做。你看，戲臺上打仗，總是一個紅臉一個花臉單刀比武，那些打赤膊翻筋斗的配腳，完全不算一個腳色。歐美人便不然，做好漢一齊去做，並不是一條幾條問題。他們的政治，像密集式的軍隊，不戰便罷，一戰是幾十萬人一齊往前。和我們的『兩將對陣拚打幾百圍合』恰恰相反。所以中國雖然出些堯舜禹湯，歸根總是『人亡政息』。歐美便沒有『人亡』的問題，若說人亡除非全國人都死了。既已不會有這種事，所以他們的政再不會息。

中國國民運動的起原，算是前清末年纔有點影子。當時所謂立憲運動，革命運動，都是訴諸一般民衆合起來對付滿洲政府。初時用文字宣傳，後來漸漸做規模較大的國會請願，最後因鐵路國有問題，做一回極猛烈的運動，便成

了辛亥革命的直接導火線。民國成立，也不能不說是由國民運動得來。但因爲那時言論集會，太不自由，到底是秘密運動多，公開運動少，所以這中華民國，並未能建設在民衆意識的基礎之上。換一句話說：這中華民國的建設，並非由全國民認識共和政治之價值，協同努力去建設他，不過極少數人用『催生符』的方法，勉強得這意外的結果。既已如此，所以始終脫不了『幾條好漢』的老思想。就令當局者果然高尚純潔，不過變名的聖君賢相，結果還會落得個『人亡政息』。何況當時並未有實力，這招牌還是假手於王莽曹操一流人掛起來呢？俗語說得好：『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十年來的民國，人人都知道他是『挂着羊頭賣狗肉』。卻還要知道：這不但是掌櫃的混帳，本來股東何嘗有開羊肉鋪的意思來？股東若決賣羊肉，那些狗肉掌櫃，能容他一刻站在櫃臺上嗎？

我方纔說歐美的『法定期國民運動』是選舉，我們的選舉——合法非法且不管——國會呢，說是選過三次了，總統呢，南南北北合計，說是選過四次了。諸君也曾聽見過某年某月某日某城某鎮某鄉某黨某人，有過一回競爭選舉的公開演說沒有？到選舉議員時候，只看見兩兩三三，交頭接耳，或是跪倒在那些都督督軍的膝前，懇求指派；或是派出成隊成隊的擄客，放盤買票。到選舉總統時候，除買票外，還拿兵圍着議員，口口聲聲說是「人民代表」。總統口口聲聲說是「受全國人民付託」。人民嗎，他們最通達時務的，知道「北京城裏轉了朝」，已是了不得；其餘十個有八個，真是「不知有漢，何論魏晉」，還說是現在「老佛爺當家」哩，什麼烏總統烏議員，他們腦裏頭就始終沒有這個字！然而「代表」「委託」等等名詞，竟被那些大盜小偷偷用了十年了。諸君須知這種現象——買票及派兵圍議場等現象——不但北

方滿清遺孽統治的地方是如此，便是南方革命偉人統治的地方，也何嘗不是如此。這種「法定期運動」尙且沒有，那些臨時運動更不消說了。諸君想想像北京這幾年內大開門戶賣官鬻爵像廣東這幾年內明目張膽開賭販烟，（開賭是過去販烟是現在）倘使換轉在外國中無論那國國民有個不起鬩的嗎，我們怎麼樣呢？除了忍氣吞聲之外，有人敢放一個屁嗎？其餘應興應革之事，千頭萬緒，總沒有人過問，違法地方是如此，護法地方也是如此，打開窗戶說亮話，都是一邱之貉！

十年的民國鬧到這樣田地，是誰的責任呢？那些軍閥，那些官僚，那些戴假面具的偉人志士，都不足責，因為他們本來是靠這行頭來吃飯。最可惜的，有一羣自命正人君子的人，他們積極方面的心理，是孔子說的『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總認定要靠一兩個有大力的人，纔能施展他『致

君澤民』的抱負。消極方面的心理，是孟子說的『歸潔其身而已矣。』只求不肯『同流合污』。別的事也不願多管了。不瞞諸君說：我自己和我的朋友，都是這一類的人。全國中這一類人，確也不少。這一類人，原算是人體中健全細胞，但他對於毒菌，或不肯抵抗，或懶得抵抗，那麼，非讓毒菌猖獗縱橫，到處傳染不可了。所以我覺得國事之壞，責任不在他們而在我們。我絕對不敢責備別人，只有責備自己。

總括一句，可以說，中國做政治活動的人，——無論何黨何派，——都完全沒有了解民主政治的真意義，所走的路都走錯了。十年以來，號稱優秀分子的人，或是運動這軍閥打那軍閥，打倒一個軍閥，便養成個更大的軍閥，或是運動軍閥手下的人去倒軍閥，或是運動些土匪來倒軍閥，結果，那能倒軍閥的人，立刻便變成了新軍閥，鬧來鬧去，總離不了這一套。始終並沒有人從運動

國民上痛下工夫。歐美式的國民運動，所以不能發生，原因都是如此。

三 「五四」之外交的國民運動

「五四運動」是民國史上值得特筆大書的一件事。因為他那熱烈性和普遍性的確是國民運動的標本。

這回運動，從表面看來，性質完全是屬於外交的。要評論這回運動，須先把別國的國民外交運動來比較一比較：

別國的國民外交運動，大率是政府先定有強硬的對外方針，國民起來做聲援。運動是對外示威，示威的結果，不是敵人讓步，便是開戰。所以這種運動，在別國是容易不肯濫用，一用起來，力量却非常之大。「五四」外交運動，完全不是這樣：政府和國民，分爲兩橛。這種外交運動，也許全無效果，就有，也斷不能如別國的外交運動效果之大。

「五四」運動，有效果沒有呢？有。歐美一般人腦裏頭，本來沒有什麼中國問題，如今却漸漸的都有了。提起中國問題，便緊緊跟着聯想到山東問題。提起中國問題，便人人都說『日本人欺負中國』。簡單說：這回運動，算是把中日關係問題大吹大擂的擡到世界人面前去了。這便是第一種效果。

這回太平洋會議，這問題雖然沒有滿意的解決，但日本人已漸漸覺得中國民氣和世界輿論可怕，不能不稍爲讓步。這也算第二種效果。因爲這回運動，引起多數青年的自覺心。因此全國思想界忽呈活氣。這是我認爲最重要的第三種效果。

因這回運動，表示中國人「國民運動的可能性」。將來也許引起別種國民運動。這是我希望的第四種效果。

四 今後國民運動之方向外交歟？內政歟？

『五四運動』與其說是純外交的，毋寧說是半內政的，因為他進行路向，含督責政府的意味很多。論理，這種運動，應該有擴大的可能性，應該跟着就把方向移到內政方面。然而我們國民仍舊遲遲不進，什麼緣故呢？我想，緣故有兩種：

一 外交問題較簡單，容易把多數人的感情燒起來；內政問題較複雜，要轉幾個灣纔能了解，多數人看得不痛切，不着急。

二 外交問題的運動，和國內專權的人沒有什麼直接觸犯，危險程度較少，多數人樂得附和。內政問題，任提何件，都是和目前盜國殃民炙手可熱的人短兵相接，危險程度甚大，稍為計較一下，便不肯上前了。

這兩件，我確認為內政的國民運動不能發展的主要原因。但我以為今後連

動方向，非由外轉到內不可。請言其理：

(1) 外交運動的效力有一定限度，我們再沒有法子能超過這限度。例如山東問題，這回華會解決如何，恐怕就算是他的最高限度。再鬧也鬧不出什麼結果，只怕越鬧越疲了。

(2) 往後外交問題恐怕日加一日的複雜，鬧也鬧不了許多。歐戰當中和戰後一兩年，歐美人沒有餘暇經營中國，所以搗亂的只有一個日本，近來形勢一變，各國對於中國權利爭奪的故態，怕要復活。你看西藏問題，不已是一步步逼緊來嗎？我們枝枝節節的對外，恐怕對不了許多。徒然令人笑我們是「無意識的愛國」，反爲無益。

(3) 內政上局面不轉變，爭外交決無結果。外交主張，是要政府去辦的，國民不能努力建設一個像樣的政府，而拿許多話嘵嘵向人在自己是『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在人家看來，完全是一種戲論。你看，這回華會中日本人放的空氣，說：『中國算得有政府沒有？』說：『中國領土範圍發生問題。』諸如此類，幾令我們無辭可答。我們欠的外債本利無着，人家當然來商量監督財政，我們鐵路破產，人家當然來商量共管鐵路。專靠民氣抵抗，抵抗得了嗎？

因這三種理由，所以我說，以後我們若不打算做國民運動便罷，若還打算做，決然應該把方向轉變，從外交方面移到內政方面。

五 內政的國民運動之主要條件

條件有十：

第一：要積極的不要消極的。消極的運動，是主張『不要做某件事；』積極的運動，是主張『必要做某件事。』例如消極的說『當政府的人不許

『賣國』這句話誰能說他錯呢？但須要進一步說：『要做某件事某件事纔算不賣國』如其不然，那不賣國的主張，恐怕成了一句空泛的廢話。有人說中國是『否定性』的國民，他們雖然否定滿清，却不見得可定共和；雖然否定集權，也不見得可定自治。乃至否定袁世凱的人，並不是可定孫文；否定張勳的人，並不是可定段祺瑞；否定安福派的人，並不是可定奉直派。這種現象，雖然是因爲現在政治現象是『一邱之貉』，叫我們無從下一個『可定』的考語，但國民若使永遠專持『否定』的態度，沒有積極的主張拿出來，恐怕成了世界上虛無的國民便完事了。

第二：要對事的，不要對人的。漢明清議，什有九是對人問題；去了個鄧鷺，來了個梁冀；去了個劉暹，來了個魏忠賢。對付壞人是對付得無了期，費九牛二虎之力換掉一個，換來的還是一樣，試問能有幾個『九牛二虎』呀？

我們中國人總是『有治人無治法』那副舊腦筋，所以對人問題還有興味，對事問題便無興味。對付袁世凱做皇帝，還許有全國一致的時候；對付北京市的電燈却永沒有全市一致的時候。我常說：『到了中國報紙裏頭的政治新聞沒有人名字，中國政治便清明了。』所以國民運動，是表示我們國民要要求那幾樁事，當局的人，能辦這幾件事的便要他，不能的便攆他，他是張三還是李四，我們却沒有閑工夫來管。

第三：要公開不要秘密。在專制淫威之下，國民運動帶些秘密性質，或亦為事理所不能免。但我以為秘密總是罪惡，雖以極光明的人，多做幾回秘密行動，也會漸漸變壞。況且我所主張的國民運動，純然帶「國民政治教育」的意味，若是秘密，則這種作用完全失掉了。所以我主張萬事要公開，始終用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赤裸裸的把社會黑暗方面，都盡情暴露出來，

連我們自己的缺點也暴露了。一切暴露之後，自然會有辦法。

第四：要在內地不在租界。我想：中國有了這幾個租界，便製造出一種畸形的社會。假如沒有這租界，或者中國連幾句空論都沒有，也未可定。但是有了這租界，中國却是只有空論便完事了。在租界裏當志士，發幾封「快郵代電」，唱的調子比天還高。那本意是否取巧出風頭，姑且不論；但無論如何，已是隔着一層，在租界大喊大叫，總貫徹不到內地人的耳朵。而且冒險犧牲的精神減少，說話的效力也減少了。所以真正的國民運動，非離去租界到內地不可。

第五：問題要大要普遍。國民運動的問題，要爲「全民的」，然後能得多數人同情，增大他的效力。例如今年八校罷課，起初標的是教育基金問題，比較的還近於普遍，然而已不算十分普遍，因爲教育界人認爲很大，別界

的人或認爲很小。其後漸漸變爲教職員欠薪問題，那更大了。因此而犧牲學生三四個月功課，實屬不值，且不能得社會同情。學校經費爲什麼無着，因爲不能履行預算；爲什麼不能履行預算，因爲學校預算都被別的人吃去了。既是拚着犧牲學校裏幾個月光陰，爲什麼不把題目放大，鼓運起國民監督財政運動或其他運動？像學校罷課這類事情，我是最不贊成的，我希望他從此不再發現。但若到不得已而發現的時候，我望他總要把問題放大些纔好。

第六：問題要簡單明了。凡要拐幾個灣的問題，斷不能做國民運動的主題。排滿革命運動爲什麼有力？說一聲『滿洲人搶掉了我祖宗的江山』，個個都了解了。五四運動爲什麼有力？說一聲『日本人欺負中國』，個個都了解了。能穀唱得起的國民運動，總是要這一類的問題。等到將來多數

人政治智識漸充，政治興味漸濃，那麼，稍爲複雜的問題，也說得進了。

第七：要分段落。政治問題甚多，不能同時並舉。既拿一個問題做主題，就專從這個問題下全力。好像攻要塞一般，攻破這個炮臺，再攻那個炮臺。總要在某一個定期內，將某一個問題向國民耳朵邊聒噪不休，叫人人心中都認識這問題的價值。把一個問題鬧出個段落，再鬧第二個。

第八：運動主體要多方面。運動專以學生爲主體，只是學生運動，不能算是國民運動。運動專以商界或勞工界爲主體，只是商界或勞工界運動，不能算是國民運動。國民運動。縱然不能辦到「全民的」，總須設法令他近於「全民的」。運動要由智識階級發起，那是沒有法子的事；但若專靠智識階級做主體，却反於國民運動的精神了。

第九：運動不妨斷續，但要繼續。政治運動，很可以拿體育運動來做比方。

我們舞啞鈴打球，斷不能成天價去舞去打，只要歇些時再去舞一躺打一躺，常常繼續下去，技術自然會精，身體自然會強。我並不是勸許多人拋棄了他本來職業去做個『國民運動家』，只要隔些時便大家鼓起精神去做他一下。有人罵中國人只有『五分鐘熱度』，這句話我就不甘服。人類感情熱烈的高潮，原只有五分鐘，難道外國人又會過五分鐘以外嗎？只要你隔些時又來他五分鐘，再隔些時又來他五分鐘，那麼幾十幾百個五分鐘，力量却再大不過了。

第十：不要問目前的成敗。天下事本要帶着『知不可而爲』和『爲而不有』的精神去做。個人生活如此，何況國家大事。若件件打過算盤，千萬當本利還元纔去做，那麼，只好一事不做了。諸葛孔明說的『成敗利鈍非所逆睹』，真是人類生活安心立命的不二法門。試看歐美人近一百多

年國民運動事業，那一件不是經幾十年幾十次的失敗纔能做成？所以我們當着手運動之先，便要先把『失敗』兩個字批在自己預算冊上頭，只認爲應該做的，便大踏步做去。

六 目前的國民運動，該拿什麼做主題？

國民運動的重要既如彼，那應注意的條件又如此，假如我們全國人要起一次大大的國民運動，應該選擇那個題目最好呢？

平和統一運動嗎？好不好，一則是太空泛，雖然個個人都贊成，却說的都是不着邊際的話。二則是容易被野心家利用，無論是分贓的平和，是南征北伐的統一，都只有軍閥的好處，沒有國民的好處。

省憲運動嗎？好是好極了，但太過複雜，要拐幾個灣纔能說明他的必要，不能一叫便醒。而且嚕嚕嚕的法理論，多數人厭聽，又容易發生意見。

勞工運動嗎？不能說他不好，但是不切題，搔不着癢處。這是將來的問題，不是現在的問題。好像和小學校學生們講婚姻問題，他們絕對不感覺他必要，更絕對不感覺得有興味。

此外別的問題雖甚多，但各各都有些不甚適切之處。我以爲目前最痛切最普遍最簡單的，莫如裁兵或廢兵這個大問題，我們應該齊集在這面大旗底下，大大的起一次國民運動。

幾百萬兵放在國裏頭，什麼事都沒有辦法。那這幾百萬兵變回人民，這筆養兵費省下來，什麼事都有辦法。這是眼面前最顯淺的事理，全國民人人心目中都有這見解，一點便醒。對於問題本身，幾乎沒有容插異議的餘地。從政治實際上看，固然是極重要的問題，從國民政治教育上看，也是極適當的問題。要起這種運動，那程序怎麼樣呢？凡運動總須用三種手段，廢兵運動自然也

是這樣：

(1) 研究 應該有些人將問題中之問題，忠實研究。例如中國是否要有兵？要有兵要有多少？要的是怎麼樣的兵？裁兵費要多少？怎麼籌法？怎麼用法？人民裁兵的可能性在那裏？用什麼機關去裁？裁了怎麼樣安頓？……如此等等，非有人專門研究清楚不可。

(2) 宣傳 宣傳是把研究的結果傳布出去，叫他成爲輿論。或將研究結果全部分宣傳，或僅宣傳他一部分，是要看那對面的人地位如何？感想如何？有對於一般市民的宣傳，有對於軍官或兵士的宣傳，說法雖不同，總求得他了解，引起他的同情。

(3) 實行 輿論養成之後，便要起一次或數次公開的聯合的大運動——老實說一句，就是示威運動。但舉行運動時，有兩個附帶的重要條

件：（第一）運動的目的，全在表示意思，說不上有什麼行爲。一切法律外的行動，萬不可有。（第二）運動手段如罷市罷課等，自然要用，但是一天便了，斷不能因此荒廢本業。

七 『我』所應該做的事

這段題目所標的這『我』字，並非指我梁啟超自己。各人各有個『我』，要人人反省『我』應該做什麼事。這種反省的作用在那裏呢？頭一件，固然是靠他來喚起自己的責任心。第二件却更緊要，因為各人地位不同，能力不同，甲所能做的，乙未必能做。所以甲所應做的是這件，乙所應做的却不是這件。而是那件。真正的國民運動，並不是某人指揮某人去做，乃是要人人自動的去做。自動的去做，便要各人經一番反省之後，知道『我』能做那件，『我』該做那件，然後各用其長，各盡其才，庶幾可以收互助的效果了。

既已說到此處，自然我梁啓超自己的『我』應該有一番反省。我索性趁這機會明白告訴諸君罷：國內有些人，對於我這人根本懷疑，說什麼『研究系陰謀家』。這個頭銜我實在不敢承領，因為我是個感情生活的人，簡直可以說我所用的字典裏頭沒有「祕密」這兩個字。謀尙且不會，陰更不必說了。但別人對於我種種懷疑，我並不怪，因為我的舉動，表面上看來好像常常矛盾。這種性質，我雖然自認爲我的短處，却不自認爲我的壞處。這是情感生活的人應有的結果，我若把我的矛盾去掉，同時怕並把我做事的活力也去掉了。

別人怎麼議論我，我不管，我近來却發明了自己一種罪惡！罪惡的來源在那裏呢？因為我從前始終脫不掉『賢人政治』的舊觀念，始終想憑藉一種固有的舊勢力來改良這國家。所以那些不該共事或不願意共事的人，也共過

幾回事。雖然我自信沒有做壞事，多少總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壞事。我良心上無限苦痛，覺得簡直是我間接的罪惡。這還是小的；我的最大罪惡，是這幾年來懶了，還帶上些舊名士憤時嫉俗獨善其身的習氣，並未抖擻精神向社會服務，並未對於多數國民做我應做的勞作。我又想：凡人對於社會都要報恩，越發受恩深重的人，越發要加倍報答。像我怎樣的一個人，始終沒有能穀替社會做出一點事；然而受了社會種種優待，虛名和物質生活都過分了。我若還自己懶惰，不做完我本分內的事，我簡直成了社會的罪人。

我生平是靠興味做生活源泉。我的學問興味政治興味都甚濃；兩樣比較，學問興味更爲濃些。我常常夢想能穀在稍爲清明點子的政治之下，容我專作學者生涯。但又常常感覺：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責任。我覺『我』應該做的事，是恢復我二十幾歲時候的勇氣，做個學者生涯的政論家。我很盼望

最近的將來，有真正的國民運動出現。倘若有麼？我梁啓超應該使役我的舌頭和筆頭來當個馬前小卒。

外交欺？内政欺？

二十八

